

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組合特徵 及其有關問題（上篇）

謝明良

壹、前言

近三十年來，江蘇省境內陸續發掘出土許多六朝墓葬，僅見於報導的這一時期墓葬，其總數達數百座之多，數量頗為驚人。其中，絕大多數墓都出土有陶瓷，時代包括吳、西晉、東晉和南朝等各個時期。這些豐富的出土資料不僅可提供我們探討江蘇六朝陶瓷分期的客觀依據，也是理解江蘇六朝陶瓷在墓葬中組合關係等方面的重要線索。而探討江蘇六朝陶瓷的組合特徵，不僅可為今後進一步理解六朝時期江蘇地區的經濟、消費及葬俗等方面提供線索，同時比較其他省分同一時期墓葬出土陶瓷組合，亦可觀察出由於地域的不同而可能出現的差異，可為今後深入探討六朝陶瓷以及各地陶瓷消費情況、民俗信仰等提供基礎資料。此外，江蘇省出土六朝陶瓷中，有許多來自浙江省越窯所產，因此探討江蘇地區出土六朝青瓷的存在狀況，也將有助於理解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越窯之生產和行銷情況。

本文以近三十年來所累積的豐富考古資料為基礎，隨處參照檢討過去研究者的看法，嘗試對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的組合特徵及其有關問題做一綜合考察。

貳、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的分布及各期的組合特徵

江蘇六朝陶瓷絕大多數出自墓葬。就筆者的初步統計，江蘇地區出土有陶瓷的六朝墓至少有三三〇座【註一】。其中有部分墓葬或於報告書中未記明具體時代，而籠統地歸入六朝早期、六朝、南朝早期；也有報告書所推定的時代與筆者所見資料

不盡符合者，此均於本文「下篇」表後所列△附記▽參照可資對比的出土文物逐一檢討，這裏不再贅述。初步推定三三〇座墓的時代包括：東吳（三〇座，表一）、吳至西晉（九座，表二）、西晉（七二座，表三）、（東晉一三五座，表四）、晉（九座，表五）、晉至南朝（五座，表六）、南朝（四六座，表八），以及二四座無法判明其具體年代的六朝墓（表七）。此外，另有四十三處推測多數可能屬於墓葬但確實遺址性質於原報告書中並未記明者，也都出土了少量陶瓷（表九）。根據上述資料，以下擬對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的分布，以及各期陶瓷組合特徵做一考察。

一、分布情況

以地域區分，三三〇座墓分別分布於南京、鎮江、太湖、揚州、洪澤湖等五大地域【註二】。其中又以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故都所在南京地區最爲密集，計二〇二座【註三】。其次，地處京畿附近的鎮江地區既是東吳政治、經濟及戰略要地，也是北方流民羣集之地，計有八一座伴隨有陶瓷的六朝墓，其數量僅次於南京地區【註四】。曾爲高級士族周氏家族墓地所在，又爲豐富的魚米之鄉太湖地區也發現了二〇座墓【註五】；揚州地區發現的二六座墓多集中於胥浦一帶；洪澤湖地區發現最少，目前只見於湖的南岸盱眙縣的一座西晉紀年墓。

二、個別器類的出土頻率

所謂出土頻率，是指個別器類的出土次數與同一時期墓葬總數的百分比。儘管江蘇六朝墓中有部分曾經盜掘或擾亂，各個時期的墓葬總數亦有差異，不過大體而言，出土頻率仍基本反映了各時代較爲整體的使用趨勢和普及狀況。

東吳時期

截至目前，可確認屬東吳墓葬計三十座，分別分布於南京、鎮江和揚州等三地區。個別器類以碗盞所佔比例最高，半數以上墓葬都曾出土。鉢類或各式帶繫盤口壺、雙繫罐、虎子以及包括若干細部造型不明的罐類亦佔了相當的比例。值得留意的是，若干明器模型和動物俑類於整體出土陶瓷中更是突出。如灶、鷄峙【註六】、磨或搗、臼或杵、井、豬圈、箕、篩、勺

、倉、雞或廁、鴨、豬等均佔同一時期陶瓷較高的比例。其次，作為當時殉葬明器之一造型特殊裝飾繁縟的穀倉罐或五聯罐也相當突出，前者多屬青瓷，有七座墓曾經出土；後者均為陶器，計八座墓出土該式作品。出土頻率表明：東吳墓除了碗、盞、鉢、罐等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器皿類之外，明器實佔了顯著的地位，可說是東吳墓陶瓷具有特徵的組合之一。而從出土的屋、案、几、篩、磨、擂、臼、杵、杙、鉢、簋、甑或豬、雞、鴨、犬、羊、鵝、熊、鵠、馬等屬明器範疇作品多為未施釉的陶器，少數為低溫釉陶等情形看來，過去有研究者主張東吳時期青瓷已逐漸代替陶器，若干墓葬青瓷中又以明器為主的看法【註七】，應僅為個別現象，並不符合當時一般狀況。

就東吳時期出土陶瓷的種類而言，除有碗、盞、鉢、洗和各式盤罐類、明器模型、動物俑、人物俑外，還包括有燈、薰、孟、扁壺等作品。壺罐類中有的如高淳化肥廠一號墓所出加飾雞首的所謂雞頭壺【註八】，也有的如句容寶華陸家院墓出土飾虎頭的作品【註九】，然而均不多見。其次，南京清涼山吳甘露元年（二六五）紀年墓所出青瓷熊燈或羊形器【註一〇】、南京甘家巷第三十三號墓出土的青瓷獅形器【註一一】或同甘家巷第十四號墓出土的頂罐陶人俑【註一二】，以及金壇縣永安三年（二六〇）墓所出青瓷鳥飾燈、釉陶騎馬俑、陶船等【註一三】，均為目前東吳墓僅見的出土實例。

此外，就東吳墓出土陶瓷的材質而言，相對於明器模型和俑類多為陶器，其他作品如虎子、蛙形盃、盤口壺或前述獅形器、羊形器以及加飾雞首、虎頭的壺罐類一律屬青瓷，不見陶器作品。從而得知，當時的陶瓷製作已經出現因應不同的用途或若干特定器形而有意識地選擇不同的質材來生產。特別是三十座東吳墓出土十四座，九座吳至西晉墓中出土七座的盤口壺均屬青瓷一事，更是表明器種和材質的緊密關聯。從這裏也不難推測得知，器物的消費用途往往是客戶生產者選材的重要依據之一。青瓷之外，南京建衡二年（二七〇）墓【註一四】、甘家巷高場一號墓【註一五】、鎮江丹徒葛村一號墓、金壇永安三年（二六〇）墓各出土了若干施褐釉的作品。

西晉時期

七十二座西晉墓陶瓷出土頻率亦以碗、盞居首位，計三十六座墓出土青瓷碗盞、鉢類、雙繫罐、盤口壺、四繫罐，若干細部造型不明的罐類亦佔了相當的比例，與東吳時期大體相近。穀倉罐仍承襲東吳傳統持續燒造，但陶製五聯罐則趨衰退，

僅兩座墓出土，後者且只見於南京地區。就出土的模型或俑類等明器而言，青瓷羊圈、犬欄較東吳時有增多趨勢，且開始出現犀形或蛟龍形鎮墓獸。不過如杵臼、倉、甑、箕、豬、雞、鵠、篩、椿、羊、犬則相對減少，而東吳時期較流行的碓、井、廁、屋、案几等已絕少出現於西晉墓。

另一方面，西晉陶瓷中有部分器類繼承東吳傳統並有進一步的發展。如唾壺、雞頭壺、扁壺、獅形器或硯等均較前期常見，同時出現了直筒式罐、托盤、耳杯盤、耳杯或陶座等許多東吳時期不見的新器形。宜興周墓墩永寧二年（三〇二）紀年墓出土的所謂神獸尊更是前所未見造型別緻的作品。

西晉墓陶瓷出土頻率表明，儘管碗、盞、鉢、罐等具有日常器用造型作品一如前代仍然頗為流行，然而陶製明器模型則顯著衰退，若干明器模型如篩、杵、臼、釜、鍋、碓、廁、井或雞、豬、羊、犬、猴、鵠等動物俑雖與東吳時期同屬陶質，不過豬圈、羊圈、雞峙或犬欄等模型則多屬青瓷，表明西晉時青瓷的燒製更為普及。

東晉時期

東晉墓數量最多，計一三五座。所出陶瓷以碗盞類頻率最高，其次如盤口壺（七十二座）、雞頭壺（五十三座）、唾壺（三十六座）、憑几（三十四座）、硯（三十三座）、耳杯（二十五座）、榻（二十二座）、人俑（十八座），以及罐、盤、薰爐、盆、燈、勺等都佔有較高的比例。其中盤口壺、雞頭壺、唾壺、耳杯、硯、榻、薰爐、陶座或羊尊均較西晉時顯著增多，但雙繫罐、四繫罐、獅形器、虎子出土頻率則較吳至西晉時期稍低。而作為吳或西晉時期具有時代特徵的堆塑穀倉罐和五聯罐則已消失。

明器模型類中，除了憑几大量出現，牛車有所增多且集中出土於南京、鎮江兩地區，其餘作品如案几、屋、灶、井、倉等均較前代顯著下降，並且基本不見流行於東吳，至西晉仍然持續生產的篩、臼、杵、箕、碓、甑以及各類動物圈欄畜舍。動物俑的種類亦趨少，基本不見雞、羊、犬、鵠等作品，但見有少量馬、牛和豬，人俑則明顯增多。上述明器模型和俑類均為陶器，不見青瓷作品。

東晉青瓷製品種類比起西晉時亦有所增減，穀倉罐、虎頭罐、直筒式罐、扁壺等於東晉已經消失，但新出現了博山爐、

大口長頸蛙尊和羊首壺等，後者於壺肩加飾羊首的所謂羊首壺的出現，正與模擬羊體造型的所謂「羊尊」亦以東晉最爲流行一事吻合。東晉陶瓷質材，除青瓷、陶器或施加薄黃釉的釉陶之外，還見有較多的黑瓷，器形包括盤口壺、帶繫罐、唾壺、雞頭壺、蛙尊、鳥飾盆、鉢、瓷碗、燈、薰爐、硯、勺和水盂等，其中又以雞頭壺最常見，計九座墓都曾出土。

南朝時期

四十六座南朝墓所出陶瓷器形種類明顯少於兩晉時期。如虎子、羊形器、獅形器、盂等已基本消失，而繼前代持續生產的盤口壺、硯、唾壺、雞頭壺、盆、耳杯等出土頻率亦明顯下降。所出明器組合亦與前代有異，特別是陶人俑繼東晉以來逐漸流行的趨勢而有進一步的發展，估計至少有二十三座墓都曾出土，是僅次於碗盞類出土頻率最高的作品【註一六】。其次，除了車（五座）、屋（四座）、馬（四座）或所謂厚形鎮墓獸（六座）出土頻率較前代增高外，其餘明器模型僅見憑几（九座）、灶（四座）、豬圈（二座）、倉（二座）及極少量的井、案几、釜鍋和甗等少數幾類，且出土頻率較前期降低。動物俑除馬外，只能見到少量的雞或羊等作品。

另一方面，陶座、托盤和蓋罐則較常見。特別是南京宋家埂【註一七】、麒麟門外靈山【註一八】、對門山【註一九】等地南朝墓所出青瓷蓮花尊，更是南朝始見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相對於這一時期明器均屬陶器，其實用器造型的唾壺、蓋罐等均爲青瓷。雞頭壺亦較東晉少見，其絕大多數屬青瓷，但南京丁甲山四號墓【註二〇】或趙士岡南朝遺跡（遺址性質不明）【註二一】曾出土黑褐釉作品。南朝黑褐釉作品於碗盞類亦偶可見到，但明顯不如東晉流行。

叁、器形種類及其與時代的關係

江蘇六朝陶瓷器形種類豐富，爲便於討論，有必要予以大致分類。然而墓葬出土陶瓷中事實上包括若干用途不明的作品，因此目前還很難針對各個作品的功能給予全面而客觀的分類。與此相對的，六朝陶瓷中也有不少模擬自現實生活的倉、廁、杵、磨、灶、畜舍和各種俑類等可確認屬明器範疇作品；以及推測多數屬日常生活器用的碗、盞、盤、鉢、罐等器皿類。

因此以下擬以作品的造型及其可能的用途做為分類的基準，至於若干用途不明或尚有爭議的作品，則以其造型或裝飾特徵另行歸類【註二】。此外，由於墓葬出土陶瓷種類既多，大小尺寸也不盡相同，若干具有類似造型特徵作品於不同發掘報告書可能會出現不同的定名，而同一名稱作品彼此的造型也有可能並不完全相同。對於這點，本文儘可能參照報告書上所揭載的圖版予以統一歸類，部分於報告書上未載圖版或所刊圖版不甚清晰的作品，原則上依據原報告書的定名。

一、壺、罐、罍、尊

壺、罐類是六朝陶瓷重要的器種之一，造型種類豐富，主要包括盤口壺、各式帶繫罐（含帶蓋者）、帶鏊罐、小罐、五聯罐、穀倉罐，以及扁壺、唾壺和飾有各種動物頭部造型俗稱為鷄頭罐、虎頭罐或羊首罐等作品。相對於罍類一般均為大口罍，所謂的尊造型則各不相同，計有長頸大口尊、帶流尊、蓮花尊以及於長頸大口尊加飾蛙首、蛙足的蛙尊等。

推測屬貯酒器的盤口壺【註三】，不僅流行於整個六朝時期，其出土頻率亦較高。東吳墓盤口壺的出土頻率僅次於碗盞類或灶等少數明器模型；西晉時僅次於碗盞類和帶繫罐；東晉時也僅次於碗盞類；至南朝時只少於碗盞和若干罐類及陶人俑，可說是六朝時期重要的基本器形之一。就出土頻率而言，明顯以東晉時最流行，除七十二座東晉墓曾經出土，屬東晉時期但遺址性質不明的南京西善橋【註四】或丹徒縣高資【註五】也分別出土了青瓷或黑褐釉作品。其次，鎮江磚瓦廠第三號西晉墓出土有八件盤口壺【註六】；南京象山推測屬東晉王廙墓也出土了十件【註七】；吳縣楓橋何山東晉墓更出土十三件之多【註八】，說明盤口壺於六朝時期，特別是兩晉時期流行的情形。盤口壺絕大多數屬青瓷，少數作品如前述丹徒縣高資或南京呂家山一號東晉墓【註九】、南京虎踞關東晉墓【註一〇】則出土黑褐釉作品。除了揚州地區邗江縣兩座南朝墓曾出土報告書未載圖版，詳細情形不得而知的灰陶盤口壺【註一一】，其餘可確認的作品不見陶器。

帶繫罐造型頗為多樣，以繫耳而言，計有雙繫、雙複繫、四繫和六繫等，其中有部分作品均帶蓋。一般而言，雙繫罐多見於吳至西晉墓，四繫罐和雙複繫罐則多見於西晉以來墓葬，六繫罐則多出現於東晉墓。六繫罐多於壺罐肩部左右兩側各置一組複式縱繫，前後相對處另置一橫繫，南京郎家山第四號墓【註一二】、趙士岡墓【註一三】或象山【註一四】等東晉墓都有出

土；但也有如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所出肩四周各置一橋形橫繫，其間另置二縱繁的六繫罐【註三五】。江蘇地區南朝墓帶繫罐以四繫罐較常見，其中不少作品於罐身飾浮彫覆蓮瓣，帶蓋者亦有於蓋面加飾蓮瓣紋，繫耳多呈橋形橫繫。

帶繫罐較少見，目前最早見於鎮江象山第三號東晉墓【註三六】，南朝墓出土稍多，於南京宋永徽二年（四七四）明曇憺墓【註三七】、中華門外板橋鎮墓【註三八】和南京董家山墓或西善橋宮山墓等都可見到【註三九】。象山東晉墓所出作品爲青瓷，南朝墓所見則均屬陶器。

五聯罐於大口壺肩四周環飾四只小罐，均只見於吳至西晉墓，而以東吳時期更常見，除金壇吳永安三年（二六〇）墓作品施褐釉【註四〇】，其餘均屬素陶。與五聯罐關係密切的所謂穀倉罐亦只見於吳至西晉墓，絕大多數屬青瓷，少數作品如南京甘家巷高場一號吳墓係於陶胎上施褐黑釉【註四一】，江寧縣殷巷公社吳墓作品則爲紅陶加彩【註四二】。五聯罐和穀倉罐於東晉時已經消失。

推測屬酒器的扁壺最早見於南京郭家山吳永安二年（二五九）墓【註四三】，但以西晉時較多見【註四四】，所出作品一律爲青瓷。扁壺計可分二式，一式爲直口、短頸、扁圓器身下置橢圓狀高圈足，吳縣獅子山西晉元康五年（二九五）墓【註四五】、南京前頭山一號西晉墓【註四六】或金壇縣西晉遺址【註四七】都曾出土。另一式呈直口、短頸、方肩、扁方壺身下置四足，宜興周墓墩西晉元康七年（二九七）周處墓【註四八】和無錫西晉永興二年（三〇五）墓都有出土【註四九】。從金壇縣出土扁壺壺身陰刻「紫是會稽上虞范休可作埤也」等字得知，這類壺於當時稱作「埤」【註五〇】。

唾壺亦是六朝陶瓷中重要的器類之一，各代均曾出土。東吳墓出土頻率較低，西晉時明顯增多而最流行於東晉。一三五座東晉墓計三十六座曾經出土，但至南朝時稍趨衰退，四十四座南朝墓僅七座出土唾壺。除若干東晉墓出土有陶器或褐黑釉，其餘唾壺均屬青瓷。

於壺罐肩部加飾動物首形象的作品以所謂的雞頭壺最常見。雞頭壺見於六朝各個時期，東吳墓較少見到，但鎮江高淳化肥廠一號吳墓曾經出土【註五一】。西晉墓出土頻率明顯增高，至東晉時廣爲流行，一三五座東晉墓計五十三座都有出土，其出土頻率僅次於碗盞類和盤口壺，至南朝則又稍趨衰退。就雞頭壺的造型而言，吳墓所見多於大口圓腹罐肩貼飾雞首和雞

尾，西晉至東晉初作品多於盤口壺飾鷄頭和尾，東晉時鷄尾已爲把手所替代，並且隨著時代推移鷄頭加高，鑿手高出盤口愈多；所出作品多屬青瓷，但東晉至南朝時間可見到黑褐釉作品【註五二】。另一方面，於器肩飾虎頭或羊首的壺或罐相對較少，然均屬青瓷。虎頭罐目前只見於鎮江句容一號東吳墓【註五三】和南京郎家山五號墓【註五四】以及梅家山一號等西晉墓【註五五】；羊首壺只見於鎮江農機學院一號墓【註五六】和南京幕府山一號墓等兩座東晉墓【註五七】。此外，南京中華門外郎家山東晉墓曾出土所謂豬嘴頭壺【註五八】，不過據所載圖版看來應爲帶頸鷄首壺【註五九】。

尊類定義較廣而不統一，因此經報導的所謂尊的造型並不相同。較常見的有長頸大口圓腹尊，時代均集中於東晉墓，有青瓷和黑褐釉兩種，青瓷曾見於南京趙士岡東晉遺址【註六〇】；黑褐釉見於鎮江跑馬山東晉墓【註六一】。其次，於長頸大口圓腹尊加飾蛙首和蛙足的所謂蛙尊，以及於同式大口圓腹尊加置短流或把的帶鑿尊，目前亦只見於東晉墓【註六二】，前者曾見於鎮江東晉早期墓【註六三】，後者則見於鎮江象山三號東晉墓【註六四】。

蓮花尊是南朝以來流行的新器類，均於器身上下滿飾蓮瓣紋，具有明顯的造型和裝飾特徵。該類作品一般器形高大，江蘇省之外，湖北、河北、山東等省南北朝墓亦見類似青瓷作品【註六五】。

罐類出土較少，較具特徵的是大口罐，時代均較早，見於鎮江金壇永安三年（二六〇）東吳墓【註六六】以及宜興周墓墩二號墓【註六七】、南京梅家山一號墓等西晉墓中【註六八】。金壇吳墓作品加飾拍印紋且施褐釉；西晉墓所見均爲青瓷，其中以梅家山一號墓罐整體滿飾幾何形拍紋最爲別緻。

此外，於西晉至東晉早期墓中偶可見到一種施暗紅色釉的帶頸小口罐。該類作品尺寸極小，西晉元康七年（二九七）周處墓【註六九】或南京象山七號東晉王廙墓【註七〇】所出作品高度均在五厘米以下。值得一提的是，經發表的數百座南方六朝墓中除上述二墓及南京獅子山一號西晉墓外均不見出土該類小罐，然於河南、河北、山東、遼寧、甘肅等省晉墓却經常可見【註七一】，而以洛陽晉墓出土最多。過去有研究者推測該類小罐或來自洛陽，是於賜葬時裝盛貴重液體如香料之類運送至南方【註七二】。筆者曾親見實物，從其胎釉看來可以同意部分研究者所主張，應是來自北方燒製的鉛釉陶器【註七三】。

二、碗、盞、鉢、洗、杯、盤

由於各發掘報告書所記載的碗、盞、鉢、盪、皿、盤、洗、盆或缸、甕、甌等作品常因報告者個人的理解而有所出入，定名並不一致，因此以下僅能就報告書所揭載的圖版及報告者的文字敘述予以初步歸類。六朝陶瓷當中以碗、盞類出土頻率最高，一直佔著各期器物出土頻率的首位。就出土頻率而言，其材質以青瓷佔絕大多數，但各期中均包含部分陶器作品，而於東晉和南朝時期墓葬則又可見到施黑釉或醬釉作品。各個墓葬所出碗盞類數量不一，然西晉時期若干墓葬都出土十件左右，數量較大。

盆、鉢或洗類各代均出土，被定名為洗的作品除南京鄧府山西一里處碧峯寺西晉墓等少數作品屬陶器【註七四】，其餘多屬青瓷。南朝墓洗類出土較少，但見於南京太平門外一座南齊墓【註七五】。鉢、盆類於東吳時期陶器的出土頻率略同於青瓷，但西晉時期則以青瓷較常見，南朝時除丹陽建山金家村墓外【註七六】，所見均為陶器。盆、洗、鉢類除常見的直口、弧身、平底作品之外，還有敞口、斂口及敞口折沿等不同造型特徵。約於西晉至東晉之交則又見有青瓷罐鉢，鎮江羅城城內第三號晉墓【註七七】、鎮江象山紅星大隊一號東晉墓【註七八】、和南京象山七號東晉墓都有出土【註七九】。此外，鎮江跑馬山八號東晉墓曾出土盆內飾一立體飛鳥的褐釉作品【註八〇】，其與金壇吳永安二年（二六〇）墓所出青瓷鳥飾燈有異曲同工之妙【註八一】。

盤碟類數量既多，種類也很豐富。除了各代均出土的平底圓盤，還有方盤、承盤、托盤、耳杯盤、高足盤、三足盤以及俗稱為菓盤或果盒的格盤等。東吳墓盤類均為陶器，其中趙士岡吳鳳皇二年（二七三）墓出土了方盤【註八二】，可惜詳細造型不明。所謂的承盤見於吳縣獅子山西晉元康三年（三九三）墓的青瓷作品【註八三】；東晉時較常見一種於長方形盤左右兩側飾耳的作品，南京汽輪電機廠【註八四】和象山七號墓都有出土【註八五】，後者還於盤上置二只耳杯。

耳杯盤較早見於南京高家山二號吳至西晉墓【註八六】，西晉墓如宜興周墓墩二號墓【註八七】、吳縣獅子山四號墓【註八八】、南京西崗墓【註八九】、板橋鎮石閘湖永寧二年（三〇二）墓都有出土【註九〇】，且均為青瓷。經報導的東晉墓出土的耳

杯盤例子較少，不過從東晉墓出土較多耳杯，結合西晉時承置耳杯的盤之造型並不一致等情形推測，東晉墓耳杯盤數量應更大，可能是由於出土時承置耳杯的盤及其上的耳杯未置一處，因此難以判斷並予以報導。其次，耳杯自吳末西晉墓出現以來，流行於東晉和南朝。西晉墓耳杯多為青瓷，東晉墓則多屬陶器，至南朝時只見陶器一種。此外，約於南朝時出現了盤中心置一明顯托圈的盞托，南京仙鶴門【註九一】、堯化門【註九二】和江寧縣吉山南朝墓都曾出土【註九三】，其中吉山南朝墓屬青瓷，餘為陶器。

高足盤較少見，目前僅知南京通濟門外徵集得來的一件青瓷作品【註九四】。三足盤和三足硯頗難明確區分，不過從宜興西晉元康七年（二九七）周處墓所出三足盤上置帶蓋奩和勺【註九五】；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的所謂瓢尊係於三足盤上置帶把水盂【註九六】；吳縣獅子山四號東晉墓出土盤心滿釉且裝飾花紋的青瓷三足盤【註九七】等作品造型看來，三足盤的口沿多呈平口或直口，盤心較平，其與盤心上弧口沿呈子母口的習稱為硯的作品有所不同。

江蘇地區出土俗稱菓盒或菓盤的格盤最早見於江寧縣黃家營吳墓【註九八】，較流行於東晉時期。西晉的格盤多為陶器，但間可見到青瓷作品，一般而言，西晉以前多為長方式，至東晉以後則屬圓式。此外，過去南京一座墓葬出土陶格盤與帶有魏正始二年（二四一）銘文的銅弩機共出【註九九】，然從其餘伴隨文物推測該墓的時代應可晚至晉代。從江西南昌晉墓出土的漆格盤器底有「吳氏橘」銘文得知，這類格盤於當時稱作「橘」【註一〇〇】。

三、盂、注、硯

報告書所報導的盂、注、水丞或硯的造型頗為豐富。所謂的水盂有的如溧陽吳鳳皇元年（二七二）墓所出，於直筒形腹平折肩上置短直口【註一〇一】；也有的如江寧縣吳天冊元年（二七五）墓所出，呈小口、弧肩、碩腹造型【註一〇二】。但兩式作品均不多見，目前所見均為青瓷。

水盂多呈大口、扁圓式，其上多飾印花網紋帶或各式幾何形印紋，是六朝陶瓷中具有特色的器種之一。該類作品均屬青瓷，時代也相當集中，多見於吳至西晉墓，最遲不晚於東晉早期【註一〇三】。紀年墓如江寧縣西晉太康六年（二八五）曹

翌墓【註一〇四】、南京郎家山西晉元康三年（二九三）墓【註一〇五】、江寧縣張家山西晉元康七年（二九七）墓【註一〇六】和六合縣元康九年（二九九）墓都曾出土【註一〇七】。儘管作品造型有帶繫或無繫之分，器底有平底或假圈足之別，不過基本器形大體一致。南京西崗西晉墓出土作品還加置蓋，蓋鈕呈雙鳥相向接嘴造型【註一〇八】，從而推測這類水孟可能原亦有蓋。

此外，另有一類於扁腹或半圓形器身上飾各式動物形首或足的水注、水孟類，其中又以飾蛙首和蛙足的蛙形孟較常見，時代集中於吳至西晉墓，紀年墓如南京趙士岡吳鳳皇三年（二七三）墓【註一〇九】、郭家山吳永安二年（二五九）【註一一〇】、金壇縣吳永安三年（二六〇）墓【註一一一】都曾出土。其次，南京御道街標營一號吳至西晉墓則出土了器身飾葉形翼紋的所謂龜形孟【註一二二】；吳縣獅子山西晉元康五年（二九五）墓另出土了飾兔首的兔形孟【註一二三】；現藏蘇州市博物館徵集得來的作品則為飾伏熊首足的熊形孟【註一二四】。上述加飾動物首或足的水注、水孟類均屬青瓷，其於江蘇出土時代集中於吳至西晉墓，東晉以後基本不見。

陶瓷硯是六朝墓常見的作品之一。有青瓷和陶器二類，器形則有三足、四足、六足和帶座式等，而以三足硯最常見。就出土頻率而言，以東晉墓出土最頻繁，南朝、西晉次之，吳墓較少出土【註一二五】。吳墓所出僅有陶器一類，西晉時青瓷硯、陶硯並存，而以青瓷居多數；至東晉、南朝時兩種材質比數相差不大。長方形或方形硯較少見，目前僅見於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的帶蓋作品以及邗江甘泉六里一〇九號東晉墓的四足硯【註一二六】。此外，南京娘娘山一號東晉墓曾出土陶「黛板」【註一二七】；汽輪電機廠東晉墓曾出土兩件灰黑陶長方形板【註一二八】，然後者是否確屬硯類？還有待進一步的資料來證實。此外，江蘇六朝墓四足硯只見於南京童家山南朝墓【註一二九】，六足硯僅見於南京光華門大教場所出東晉作品【註一二〇】，而座式硯也只見於南京丁甲山出土的南朝青瓷作品。【註一二一】

四、薰爐、燈、鐏斗、簋、奩

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薰爐類種類不少，有的係於短筒形鏤孔器身之上加置丁字形提梁，也有於鏤孔罐形器身飾雙環耳。

上述二式作品多見於吳至西晉墓，然而名稱並不一致，一般多將飾提梁的稱爲提籃薰，飾雙耳的稱之爲烘罐。從浙江上虞江山吳天紀元年（二七七）墓出土的青瓷提籃薰【註二二】或江西瑞昌馬頭吳至西晉墓【註二三】出土的青瓷帶蓋烘罐中均置有碗或杯碟等情形看來，該類作品有可能即「色就篇」「筵篲」顏注所稱的「籩」或「客」。它們既可盛杯，亦以爲薰籠行籠形或盆形鏤孔香籠下置支柱並連接平底承盤的薰爐，該類作品材質種類多樣，一般多爲青瓷，但南京棲霞山甘家巷三十一號墓【註二六】或南京娘娘山一號墓曾出土醬釉作品【註二七】；南京西善橋東晉泰和四年（三六九）墓也出土了同式陶質作品【註二八】。由山岳形蓮瓣狀薰蓋和帶支柱的鉢式器身並連接承盤的所謂博山式香薰，目前亦多見於東晉和南朝墓，而又以東晉墓最常見。鎮江東晉隆安二年（三九八）墓【註二九】、鎮江畜牧場二七六大隊一號墓【註三〇】以及南京砂石山一號墓都有出土【註三一】，除隆安二年墓作品屬青瓷外，餘均爲陶器。南朝墓所見薰爐均爲陶器，其中中華門外板橋鎮墓作品爲承柱式豆形薰【註三二】；仙鶴門【註三三】和童家山【註三四】等兩座南朝墓作品屬博山式薰爐。

就報告書所報導的燈器的時代而言，目前僅見於吳、東晉和南朝時期，西晉墓不見出土。東吳墓燈器多爲陶器，不過南京清涼山甘露元年（二六五）墓曾出土著名的青瓷熊燈台【註三五】。東晉墓燈台有陶和青瓷、醬釉等多種質材，而以青瓷居多數，醬釉作品則見於南京娘娘山一號墓【註三六】。南朝墓如南京對門山梁墓【註三七】、童家山墓【註三八】等都出土了青瓷三足燈；蔡家塘墓也出土了陶燈【註三九】。此外，南京中華門外板橋公社南朝墓則出土了報告書中稱爲「插器」的三管陶燭台，較爲特殊【註四〇】。

鏹斗較流行於吳至西晉，吳墓作品以陶器居多，西晉墓除江寧縣索墅磚瓦廠一號墓曾出土釉陶作品【註四一】；揚州地區胥浦元康七年（二九七）墓出土陶鏹斗外【註四二】，其餘均爲青瓷，從宜興周墓墩二號墓【註四三】或南京西崗【註四四】等西晉墓出土的青瓷鏹斗得知，鏹斗一般置於盆中，鏹斗內又置一勺，由三件組成一套。

鏹斗盆有的置三足，有的呈平底；有的於盆上部左右方近口沿處飾二只實心鼻狀鑿，有的則無任何裝飾。儘管目前尙無東晉墓出土鏹斗的正式報導，不過如東晉永和元年（三四五）劉氏墓【註四五】或太元十七年（三九二）夏金虎墓【註四六】

等都出土了陶質所謂三足爐；鎮江磨箬山一號墓也曾出土被定名為陶鼎的作品【註一四七】。其造型均與一般所見的鏹斗盆相類似，然是否確屬鏹斗盆還難遽下斷言。無論如何，就今日可判明為鏹斗的江蘇六朝墓所出陶瓷作品而言，其較流行於吳至西晉時期，南朝墓鏹斗出土實例亦較少，目前只見於南京蔡家塘一號墓【註一四八】和中華門外板橋鎮墓【註一四九】出土的陶器作品。

蓋均集中於吳至西晉墓，紀年墓如南京上坊吳天冊元年（二七五）墓【註一五〇】或吳縣獅子山西晉元康五年（二九五）墓【註一五一】都有出土。除了南京御道街標營吳至西晉墓出土該類陶器作品【註一五二】，其餘均屬青瓷。

青瓷奩見於吳縣獅子山四號西晉墓，其下置三蹄足【註一五三】，整體造型與宜興周墓墩西晉元康七年（二九七）周處墓出土所謂陶斛有類似之處，但後者帶蓋【註一五四】。東晉時陶瓷三足奩似已不見出土【註一五五】。此外，南京童家山南朝墓出土了所謂帶蓋陶奩，然呈筒式平底【註一五六】。

五、動物形器

所謂動物形器是指模擬動物或異獸造型的象生器物而言。這類作品與前述加飾動物首、足的獸首壺罐或所謂的蛙形盂等作品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器物本身即已寫實地表現出某一類動物或異獸的完整造型和特徵。常見的作品有所謂的虎子、獅形器、羊形器以及較為罕見報告書中稱為鳥形水注、熊尊和神獸尊等作品。

江蘇六朝墓虎子均屬青瓷。就其出土頻率而言，明顯流行於吳至西晉時期。推定東吳時期的三十座墓中計八座都會出土；而七十二座西晉墓亦有十三座曾經出土。此外，南京五塘村一號吳至西晉墓【註一五七】、或遺址性質不明的南京趙士岡工地【註一五八】、中華門外救濟分會磚瓦廠【註一五九】等地亦出土了吳至西晉時期青瓷虎子。東晉墓虎子出土頻率明顯降低，一三五座東晉墓只七座出土，至南朝時已經消失。就南京地區出土虎子的墓葬時代而言，計吳墓六座、西晉墓九座，東晉墓二座，因此過去有研究者將虎子列入南京地區東晉墓的主要器物的看法【註一六〇】，似與目前考古所見不符。上述出土有虎子的墓葬，其出土數量均為每墓一件。

獅形器亦只見於吳至東晉墓，所出作品亦只見青瓷。就其時代而言，除了南京甘家巷二十三號吳墓【註一六一】，和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分別出土一件之外【註一六二】，其餘作品均出於西晉墓。七十二座西晉墓中有八座曾出土，而遺址性質不明的南京隋家倉工地【註一六三】或江寧縣秣稜公社橋南大隊【註一六四】也各出土推測屬西晉時期的青瓷作品。西晉墓所出青瓷獅形器多爲一墓一件，但江寧縣張家山西晉元康七年（二九七）墓則出土了四件【註一六五】，爲探討獅形器的正確用途提供了有趣的線索。此外，句容西晉元康四年（二九四）墓曾出土於臥獅背上跨坐人物（人物已殘）的作品【註一六六】；南京漢中門內龍蟠里也曾出土由三隻大小相同的獅連成的殘器座，後者推測亦屬西晉時期【註一六七】。從而得知，獅形器是西晉時流行的器類之一。

羊形器出土較少，其時代亦分佈於吳至東晉時期。除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一對報告書推測屬燭台的陶「臥羊座」外【註一六八】，其餘均屬青瓷。其次，除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和南京清涼山吳甘露元年（二六五）墓分別出土一對羊形器外【註一六九】，其餘墓葬所出該類作品均爲一墓一件。青瓷羊形器多集中於東晉墓，截至目前計四座東晉墓都曾出土，東吳墓目前又見於前述清涼山紀年墓，西晉墓只見於南京西崗墓【註一七〇】。此外，推測屬晉代墓葬的鎮江晉陵羅城城內三號墓（花M一）也出土了一件青瓷羊形器【註一七一】，但於南朝時業已消失。出土資料修正了魏正謹、易家勝等研究者所主張羊形器爲吳至西晉之基本器種，不見或基本不見於東晉以後的片面看法【註一七二】。

所謂的鳥形水盂只見於南京富貴山東晉墓【註一七三】。作品雖已殘缺，但盂身後一面貼羽翼和鳥尾，另一面飾鳥爪，造型極爲特殊。而所謂的神獸尊也只見於宜興周墓墩四號西晉永寧二年（三〇二）墓的青瓷作品【註一七四】，由於出土時器內尚殘留獸骨一堆，因此有研究者推測它可能是下葬時將肉食置於其中，以作爲祭祀用的鎮墓辟邪一類的器物【註一七五】。此外，江寧縣秣稜公社橋南大隊曾出土一殘「青瓷熊尊」，整體造型呈一熊坐地吃食狀【註一七六】；熊頭頂有一圓孔，有研究者推測係插燭用的燭台【註一七七】，然確實的用途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

六、明 器

(一) 模 型 類

江蘇六朝墓出土的明器模型種類豐富，包括各式圈欄禽舍和車、船、屋、倉、廁、井、灶、釜、鍋、甑、杵、臼、磨、篩、鐘、箕、碓、憑几、案几、橙、座和推測亦屬明器的箱或盒等。

圈欄禽舍計有豬圈、鴨圈、牛圈、羊圈、犬欄和雞峙。就其時代而言，除了丹陽胡橋吳家村【註一七八】和建山金家村【註一七九】等南朝墓曾出土陶豬圈外，其餘出土豬圈墓葬的時代均集中於吳至西晉時期，而以吳墓出土頻率最高，東晉以後基本不見出土。東吳墓圈欄模型以豬圈和雞峙最常見，但偶可見到犬欄和鴨圈；作品以陶器佔絕大多數，青瓷較少見到。西晉墓亦以豬圈和雞峙最常見，而犬欄出土頻率則較東吳時大幅增多，並可見到牛圈和羊圈。作品絕大多數為青瓷，少數墓葬如南京梅家山一號墓【註一八〇】、郎家山元康三年（二九三）墓則出土了陶豬圈【註一八一】；江寧索墅一號墓則出土了釉陶豬圈、犬欄和雞峙【註一八二】。此外，九座推測屬吳至西晉墓中，除南京高家山二號墓分別出土青瓷豬圈、雞峙和犬欄外【註一八三】，南京五塘村一號墓出土陶雞峙【註一八四】，五塘村二號墓出土了陶雞峙和豬圈【註一八五】，楊州胥浦八九號墓亦出土陶製畜圈模型【註一八六】。

陶屋模型目前見於吳、東晉和南朝墓，而確實年代不明的常州市茶山鄉【註一八七】或南京「新墓三」【註一八八】等兩座六朝墓也曾出土陶屋。不過據報導後者南京墓所出陶屋呈起脊單簷，簷下一面開五洞，洞上附一雀作啄食狀，因此是否確屬陶屋？抑或為陶倉？由於未載圖版，目前不得而知。各墓所出陶屋多為一件，然前述常州市茶山鄉六朝墓則出土了四件。南朝墓出土陶屋頻率不低，四十六座南朝墓計四座都曾出土。江蘇六朝墓所出屋舍模型均屬陶器，不見青瓷作品。

就紀年墓所出牛車或馬車的時代而言，最早見於金壇縣吳永三年（二六〇）墓，該墓並伴隨出土一件陶船，是江蘇六朝墓中僅見的珍貴遺例【註一八九】。西晉墓牛車出土亦較少，目前只見於太康六年（二八五）曹翌墓【註一九〇】。東晉、南朝時陶車明顯增多，且均集中於南京地區，同地區六十七座東晉墓計五座出土，三十餘座南朝墓也有五座出土。所見作品均為陶

器。

明器灶各代均有出土，而以東吳時期最流行，三十座東吳墓計十九座都曾出土，且以陶灶居多數，僅四座墓出土青瓷灶。西晉墓明器灶亦頗為流行，不過其材質則以青瓷佔多數。東晉以後明器灶漸趨衰退，出土頻率不高，且均為陶器。從浙江紹興五星公社紅山生產大隊所出陶灶於煙囪和灶眼之間刻有「鬼灶」二字得知【註一九一】，這類作品確實是專供死者使用的陪殉明器。

模擬現實倉建築的陶倉模型出土不多，可判明的作品見於吳至東晉墓，而以吳墓出土較多，西晉墓目前又見於太康六年（二八五）曹翌墓，然未載圖版，造型不明【註一九二】。東晉墓曾見於南京象山七號墓出土的五件四角攢尖頂陶倉。【註一九三】其次，又有所謂的倉罐，然而由於報告書所稱該類作品彼此細部造型並不一致，特徵也不明顯，因此往往很難與井模型明確地予以區分。不過若就一般所謂的倉罐造型而言，多呈筒形，且有不少作品均於器肩加置三只實鑿；時代多集中於吳至西晉墓，而以西晉墓所出青瓷倉罐最常見。

井模型以吳墓出土最多，有青瓷和陶器兩種，而又以陶器居多。西晉以後井模型已明顯減少，但曾見於揚州地區西晉元康七年（二九七）墓【註一九四】、南京郎家山太元八年（三八三）【註一九五】和石門坎東晉墓【註一九六】，以及南京童家山南朝墓【註一九七】。此外，於吳至西晉墓中還見有一類大口、平肩的筒形罐，有研究者認為該類作品即水井模型【註一九八】，目前所見多為青瓷，南京吳天冊元年（三七五）墓【註一九九】或梅家山一號西晉墓都曾出土【註二〇〇】。

廁模型目前只見於吳至西晉墓，而以吳墓出土較多，有四座東吳墓都曾出土，其中南京上坊天冊元年（二七五）墓分別出土一件陶廁和青瓷廁【註二〇一】，其餘所見均為陶廁。西晉墓陶廁目前只見於南京柳塘村太康六年（二八五）墓【註二〇二】，東晉、南朝墓不見出土。

此外，篩、磨、擂、臼、杵、箕等作品亦只見於吳至西晉墓，而又以吳墓最流行。上述作品除宜興周墓墩二號西晉墓等少數墓葬曾出土青瓷作品外【註二〇三】，其餘均為陶器。其次，鐘和碓亦只見於吳墓，作品一律為陶器；推測屬吳至西晉時期的南京五塘村一號墓亦曾出土陶碓【註二〇四】，以後不見出土。

憑几最早出現並流行於東晉，南朝次之。一三五座東晉墓中有三十餘座都曾出土，所見作品均為陶器。所謂的案几或燈各代均曾出土，然就出土頻率而言，以東晉墓較常見，南朝墓出土較少，目前僅知南京太平門外齊墓出土造型不明的「陶几」【註二〇五】。上述案几或燈類，除無錫惠山娘娘堂十九號六朝墓曾出土釉陶案外【註二〇六】，餘均為素陶。此外，江寧縣東晉太和元年（三六六）卞氏王夫人墓曾出土所謂的「陶瑟」【註二〇七】，不過由於報告書中未掲載圖版，具體造型不得而知，值得留意的是據後來研究者的間接引述，同墓曾出土「灰陶床」【註二〇八】。兩者是否同屬一物？目前難以確認。

陶座始見於西晉墓，而以東晉、南朝最流行。宜興周墓墩二號西晉元康七年（二九七，墓主推測為平西將軍周處）出土了八件【註二〇九】；同周墓墩二號西晉墓也出土了三件（墓主推測係周處之子周札）【註二一〇】。此外，南京雨花村三號西晉墓出土兩件陶座【註二一一】；板橋鎮石閘湖西晉永寧二年（三〇二）墓則出土了用墓磚製成的磚座四件，均置於墓室或磚台四周【註二一二】。東晉墓陶座集中於南京地區，如郎家山四號墓【註二一三】、建寧磚瓦廠二號墓【註二一四】、砂石山墓【註二一五】、幕府山一號墓【註二一六】、五塘村墓【註二一七】、棲霞山化肥廠墓【註二一八】以及東晉豪族顏鎮之墓【註二一九】和推測屬帝王陵寢的富貴山墓【註二二〇】、南京大學北園墓【註二二一】、汽輪電機廠墓等都有出土【註二二二】。其中，富貴山、汽輪電機廠和幕府山等東晉墓所出陶座均各為四件，且均呈成對的龍形或虎形，即一般習稱的龍虎形座；南京大學北園墓出土數量最多，計有八件，包括龍形座和虎形座各一件，另成對的方形座、方形板座以及長方形座【註二三三】。南朝墓目前只見於南京地區的西善橋油坊村墓（推測係陳宜帝顯寧陵）【註二三四】、建山金家村墓（推測係廢帝東昏侯蕭寶卷陵）【註二三五】、胡橋吳家村墓（推測係和帝蕭融恭安陵）【註二三六】、和丹陽縣胡橋大墓【註二三七】，然所出確實件數均不明。

上述陶座均中間置孔或挖槽可以插物，如富貴山、南京大學北園、汽輪電機廠等東晉墓所出龍虎形座均各附陶製插管；而老虎山東晉顏鎮之墓出土的兩件陶座，亦置陶圓桿，且桿頂有孔，出土時孔內殘留陶器足；宜興周墓墩二號墓陶座中孔直通到底，據報告書稱孔中尚留有木桿殘屑。儘管陶座的確實用途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見解，有人認為應是插置松明或旗桿【註二三八】；或插置燭【註二二九】、燈盤【註二三〇】，也有的主張係插張帷幄的所謂「步障座」或「帷帳座」【註二三一】，或係置四神形象用以辟邪鎮墓之物【註二三二】。無論如何，從出土有該類陶座墓葬規模一般較大，墓主身分較高，並包括不少帝

王陵寢等情形推測，這類陶座應是較高等級墓葬所特有的隨葬器物。

推測屬明器的長方形盒，曾見於南京汽輪廠東晉墓，計出四件，其中兩件器內塗朱【註三三】；富貴山東晉墓亦出土九件長方形帶蓋箱盒，箱底外粘漆皮，報告者推測或爲『通典』卷八六所載明器「篋屨」【註三四】。

此外，常州市茶山鄉六朝墓曾出土陶塔【註三五】，是目前江蘇六朝墓僅見的作品；鎮江四擺渡蠶研所三號晉墓出土的泥質五銖錢亦較罕見【註三六】；南京東前村東晉墓曾出土陶枕【註三七】；推測屬西晉墓葬的南京梅家山一號墓【註三八】和東晉至南朝的句容陳家村一號墓【註三九】亦分別出土了陶紡輪。

(二) 俑 類

江蘇六朝墓陶瓷俑，可大致區分爲人俑、動物俑和所謂的鎮墓獸等三類。人俑又可分爲男俑和女俑，各代均曾出土，其出土頻率有隨著時代增多的趨勢，以南朝墓最流行，近半數南朝墓葬都曾出土，是僅次於碗盞類最常見的作品之一。相對於東晉、南朝墓人俑均爲陶製，吳至西晉墓除陶人俑外，偶可見到施置釉藥的釉陶或青瓷人俑，三座西晉墓都見有青瓷人俑；而金壇縣吳永安三年（二六〇）墓出土的褐釉陶騎馬俑【註四〇】，造型特殊，是目前江蘇地區六朝墓僅見的作品。

動物俑計有雞、豬、牛、鴨、羊、犬、鵝、馬、鵠、熊和猴等。熊和猴較少見，但前者見於江寧縣殷巷吳墓【註四一】；後者見於江寧縣西晉太康四年（二八三）墓【註四二】。上述動物俑類中，除了南京甘家巷高場一號吳墓曾出土所謂褐釉馬【註四三】，金壇吳永安三年（二六〇）墓出土的褐釉陶馬【註四四】，以及江寧縣西晉太康六年（二八五）曹翌墓出土釉陶犬【註四五】，其餘作品多屬素陶。就其流行時代而言，雞、豬、鴨、犬、鵝、鵠都多集中於吳至西晉墓，而以吳墓更常見，西晉以後較少見到。陶馬除前述兩座吳墓出土的釉陶作品外，均集中出土於東晉和南朝墓；陶牛亦較流行於東晉墓，其與陶車流行於東晉、南朝大致吻合。東晉貴族常以牛車代步【註四六】，可視爲現實生活於墓葬隨葬明器的反映。此外，常州市茶山鄉一座推測屬六朝時期墓葬計出土四件陶牛，出土時均置於陶屋模型旁【註四七】，較爲特殊。

江蘇六朝墓出土的鎮墓獸類從造型區分，有魚龍形和牛形兩大類。除了南京「郎墓一」六朝墓曾出土形似鱷魚的四足獸【註四八】，該類蛟龍形獸俑或所謂鱷魚俑，目前多見於西晉墓，於南京六合西晉元康九年（二九九）墓【註四九】或揚州胥

浦元康七年（二九七）墓【註二五〇】都可見到，一般呈雙目、吐舌、四足有尾。牛形鎮墓獸出土較多，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最早見於西晉墓，江寧縣西晉元康九年（二九九）墓【註二五一】，南京板橋鎮石閘湖西晉永寧二年（三〇二）墓【註二五二】出土的作品均呈牛形、獨角、脊上飾角狀飾，且均為青瓷，揚州元康七年（二九七）則出土了這類陶器作品【註二五三】。其次，於東晉南朝墓則又出現一種經常被稱為「犀」或「窮奇」背上飾多角狀飾的牛形異獸，東晉墓目前只見於砂石山墓所出作品【註二五四】，而流行於南朝墓，四十五座南朝墓計六座出土，均為陶器，且集中出土於南京地區。此外，從揚州胥浦西晉紀年墓同時出土有所謂蛟龍形獸和牛形鎮墓獸一事看來，上述兩類獸俑於墓葬中似乎還各具有不同的功能。

肆、各期青瓷與陶器的消長

有關江蘇六朝青瓷的流行時代，歷來有著不同的看法。如李蔚然氏認為南京地區東吳時期以陶器為主，青瓷所佔比例不大【註二五五】，羅宗真氏則主張江蘇東吳時期青瓷已逐漸代替銅器、漆器和陶器，若干墓葬青瓷又以明器為主，從而反駁當時隨葬明器多使用陶器的看法【註二五六】。此外，劉建國氏曾從鎮江地區墓葬資料得出東晉青瓷於遺物中數量最多的結論【註二五七】；李蔚然於前文則又以南京地區為例，主張東晉墓出土青瓷漸少，陶器明器增多。蔣贊初氏亦總結長江下游六朝墓，認為孫吳時期陶明器模型眾多，至西晉時已全部改用青瓷製作，東晉時陶明器模型衰退，但陶生活明器增多，至齊、梁、陳時陶生活明器又超過了青瓷的數量【註二五八】。以下擬在前節所考察的個別器形於各期中的出土頻率，和各期器類與時代之關係等基礎之上，結合江蘇境內各地區各期之個別墓葬所出土青瓷與陶器的數量，對江蘇六朝墓所出青瓷與陶器的消長進行初步考察。也就是說，對於某些包括青瓷和陶器兩種材質且跨越朝代流行時間較長的作品，我們可從時代的差距來觀察其材質的變化；而對於具有固定材質且見於各期的作品，則又可從該器類於各期的出土頻率，以及各期個別墓葬所出同類作品的數量來加以理解。此外，比較各期個別墓葬所出青瓷與陶器數量的多寡，不僅可直接反映兩種材質作品於各期的盛衰情況，若將之與各期器類與時代之關係結合觀察，則各期青瓷與陶器的消長，實際上往往又與各器類的流行與否有密切關係。

一、時代變遷所見個別器類的材質變化

就跨越時代且包括有青瓷和陶器等兩種材質的器類而言，計有雙繫、四繫罐或唾壺等壺罐類；或碗、盞、盤、碟、皿、洗、盆、缸、孟、耳杯、榻、提梁薰、薰爐、鏹斗、硯、羊形器以及明器穀倉罐、牛形鎮墓獸、人俑、雞峙、豬圈、犬欄等作品。其中，屬明器範疇的穀倉罐、雞峙、犬欄等目前只見於吳至西晉墓。東吳時穀倉罐多見於南京和鎮江兩地區，其雖亦以青瓷居多數，但南京地區有兩座墓曾出土陶器作品。西晉穀倉罐主要見於南京、鎮江、太湖三地區，但揚州地區曾出土一件陶質作品，其餘各地所出十多件穀倉罐一律為青瓷。其次，圈欄類中，豬圈雖也見於少數南朝墓陶質作品，不過較流行於吳至西晉墓。東吳墓豬圈和雞峙明顯以陶器居多，至西晉時則絕大多數都以青瓷為之。此外，西晉墓所出犬欄、牛圈或羊圈亦一律屬青瓷，而見於六朝各期墓葬的明器灶，東吳時明顯以陶器居多，西晉時則多屬青瓷，東晉和南朝墓目前只見陶器。至於人類俑，東吳時除曾出土一件較特殊的褐釉騎馬俑，其餘均為陶器；西晉時於南京、鎮江兩地都見有青瓷人俑，人俑於東晉、南朝時最為流行，然而作品均為陶器。牛形鎮墓獸目前見於西晉至南朝墓，除揚州地區一座西晉墓所出為陶器，南京地區兩座西晉墓出土者均屬青瓷，東晉以後不分地區所出者均為陶器。

就盤、盆、鉢等器皿類而言，東吳墓所見盤多為陶器，西晉墓青瓷盤和陶盤出土頻率相差不大，但東晉至南朝時陶盤則較青瓷盤明顯居多。盆類於吳墓以陶器居多，西晉墓則以青瓷較常見，東晉墓青瓷盆稍多於陶盆。吳墓所出鉢類青瓷與陶器出土頻率相差不大，至西晉時明顯以青瓷常見，南朝墓則以陶器居多。耳杯目前最早見於西晉墓，西晉墓耳杯以青瓷居多，東晉墓除南京地區一座墓葬外，三十餘座墓所出作品均屬陶器，南朝耳杯極少見到，所見者均屬陶器。

東吳墓出土所謂榻盤較少，且只見陶器一種，西晉墓榻盤以青瓷較常見，東晉墓除鎮江地區一座墓外，二十餘座墓所出者均為陶器，南朝墓亦只見陶榻。其次，東吳墓所出硯均為陶器，西晉時青瓷硯要多於陶硯，至東晉、南朝時青瓷硯與陶硯比較相差不大。

薰爐類包括所謂的提梁薰、雙繫烘罐和籠形、盒形鏹孔薰等。提梁薰和雙繫烘罐多見於吳至西晉墓，吳墓以陶器居多，

西晉墓則以青瓷佔大多數。球籠形三足薰見於西晉墓，所出作品均爲青瓷。東晉時較流行帶支柱的籠形或盒形鏤孔薰，以青瓷佔大多數。此外，還有博山式薰爐，該式作品多見於東晉至南朝墓，東晉墓青瓷、陶器均可見到，南朝墓只見陶器。

二、各期墓葬出土青瓷與陶器數量之比較

除了前述包括青瓷和陶器兩種材質且跨越時代持續生產的作品之外，江蘇六朝墓還出土不少跨代生產，但一般只見青瓷或少數施醬褐釉的器類，如盤口壺、雞頭壺、虎頭罐、瓷、甌、奩、虎子或獅形器等。與此相對的，目前出土的五聯罐、屋、座、案几、憑几、篩、磨、臼、杵、椿、碓、甑或雞、豬、鴨、犬、鵠等以明器模型或俑類爲主的作品，亦跨代持續生產，然其材質僅限於陶器。因此，探討江蘇六朝青瓷與陶器的消長，似還應檢討兩類不同材質作品於個別墓葬所出數量之多寡。爲了能較全面地理解各期各個墓葬所出青瓷與陶器的比數，以下的考察雖以未經盜擾的墓葬爲主，但也包括經盜掘或無法判明是否盜掘、擾亂的墓葬。

東吳時期

三十座東吳墓分布於南京、鎮江和揚州等三大地區，而以南京出土最多，計二十一座。其中南京地區七座未經盜擾的墓葬，除了趙士岡赤烏紀年墓出土四件青瓷，不見陶器外，餘下六座保存較完整墓葬所出陶器均高出青瓷數倍，如黃家營五號墓出土青瓷六件，但陶器則有三十八件之多，中華門外板橋公社墓出土青瓷五件，然陶器則有二十件。其次，經盜掘的幕府山五鳳元年（二五四）一、二號墓，一號墓出土陶器二十三件，青瓷二件；二號墓陶器三十五件，青瓷只見三件，其明顯以陶器較流行。

鎮江地區吳墓計八座，推測有五座墓未經盜掘。其中溧陽鳳皇元年（二七二）墓、金壇天璽元年（二七六）墓、唐王公社墓等均只見青瓷，不見陶器；高淳縣化肥廠墓出土陶器十八件，但青瓷亦見二十件之多。不過句容寶華陸家院墓陶器出土十件，青瓷只見四件。儘管經盜擾的高淳金山下一號墓或金壇永安三年（二六〇）墓所出陶器要多於青瓷，然而鎮江地區却不見南京地區般陶器遠多於青瓷的現象。從墓葬出土陶器組合觀察，造成這一情形的原因，似在於鎮江東吳墓以明器模型或

動物俑類陪殉入壙的數量不如南京地區同期墓葬，也就是說，將明器俑類置於墓葬雖是東吳墓出土陶瓷重要的組合特徵之一，不過南京地區吳墓所出數量却更多，而該類作品又多以陶器爲之，如南京趙士岡鳳皇二年（二七三）墓二十八件陶器中，明器模型即佔了近二十件；幕府山二號紀年墓三十多件陶器中，明器模型和俑類數量佔了二十餘件，這就造成多數吳墓出土陶器要多於青瓷這一現象。

揚州地區吳墓目前只見胥浦七〇號墓一座。出土的三十四件陶瓷中，陶器佔了二十三件之多，其中明器模型和俑類亦達二十件。這樣看來，儘管鎮江地區吳墓出土青瓷與陶器數量相差不大，若干墓葬所出青瓷數量還高出陶器，然就東吳墓整體出土作品而言，陶器無疑是頗爲流行的。

西晉時期

七十二座西晉墓分布於南京、鎮江、太湖、洪澤湖和揚州等地區。南京地區四十餘座西晉墓，除極少數墓葬如江寧縣太康六年（二八五）曹翌墓或郎家山元康三年（二九三）墓所出陶器多於青瓷外，近四十座西晉墓青瓷均多於陶器，其中且包括二十餘座只見青瓷，不出土陶器墓葬；青瓷流行，陶器衰退情形極爲明顯。鎮江地區八座西晉墓除磚瓦廠三號墓、晉陵羅城內二號墓、農機學院一號墓等各出土一件陶器外，其餘不見陶器出土。青瓷出土數量較多，如句容西晉元康四年（二九四）墓不出陶器，然青瓷出土達二十六件之多；前述磚瓦廠三號墓青瓷亦達二十餘件。太湖地區十三座西晉墓多數不出土陶器，個別墓葬如宜興元康七年（二九七）周處墓出土陶器多於青瓷，但僅屬個例。青瓷與陶器出土數量比較懸殊，如獅子山元康五年（二九五）墓、獅子山四號墓、楓橋水泥廠墓等出土青瓷均達二、三十件，但不見陶器出土。洪澤湖地區西晉墓目前僅見盱眙縣的一座西晉紀年墓，該墓出土了數量不明的青瓷碗，不見陶器出土的報導。揚州地區六座西晉墓中，除了胥浦元康七年（二九三）墓出土陶器多於青瓷外，其餘墓葬所出作品，若不是不見陶器，就是青瓷多於陶器。

因此，西晉時期不分地區，均以青瓷較爲流行。且青瓷與陶器數量相差極大，除前述所舉鎮江、太湖地區實例外，南京板橋鎮永寧二年（三〇二）除出四件陶座外，出土青瓷近三十件；而經盜掘的南京西崗墓不出土陶器，然青瓷則有四十件之多。另一方面，少數出土陶器多於青瓷的墓葬，其陶器與青瓷數量一般相差不大，極少見到東吳時期陶器遠多於青瓷的情形。

。其次，觀察西晉陶器多於青瓷的墓葬陶瓷組合，如太康六年（二八五）曹翌墓、南京郎家山元康三年（二九三）墓、揚州胥浦元康七年（二九七）墓等，其陶器多屬明器模型或俑類，結合推測屬西晉早期的南京梅家山一號墓所出陶器數量雖少於青瓷，但陶器中又以明器佔絕大多等情形看來，部分西晉早中期墓葬仍然保留東吳習俗，流行以陶器明器或俑類隨葬。

不過就西晉時期青瓷多於陶器的墓葬看來，其明器模型或俑類卻多以青瓷爲之，與東吳時期明顯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西晉墓青瓷模型或陶俑的數量在同一墓葬所出青瓷中並不佔有突出的比例，如前述句容西晉元康四年（二九四）墓出土二十六件青瓷中，明器類又佔四件；南京永寧二年（三〇二）墓三十三件青瓷中亦只見四件明器；南京西崗墓四十件青瓷中只有三件明器模型。此外，吳縣獅子山四號墓二十九件青瓷中只見四件明器模型；鎮江磚瓦廠三號墓二十六件青瓷則未見任何明器模型或俑類。上述情形表明，儘管西晉墓有不少明器模型或俑類屬青瓷製品，然而造成青瓷數量遠多於陶器的原因，則是由於青瓷器皿類數量的大幅提高。

東晉時期

一三五座東晉墓分布於南京、鎮江、太湖和揚州等地區。南京地區六十七座東晉墓多數經盜掘或擾亂，而推測保存較完整未經盜擾的二十一座墓，青瓷出土較多的有十五座，陶器多於青瓷的有五座，另一座青瓷與陶器數量相當，說明南京東晉墓亦以青瓷較流行。綜觀南京地區東晉墓所出青瓷與陶器，其數量一般相差不大，儘管亦有如王興之夫婦墓出土十件青瓷，不見陶器，或老虎山二號顏琳墓出土十八件青瓷却只出土兩件陶器等情形，不過一般不見西晉時期般青瓷普遍遠高於陶器的組合特徵。值得留意的是少數推測屬帝王陵寢的南京大學北園墓、富貴山墓、汽輪電機廠墓或東晉豪族象山七號王廙墓等都出土了數十件陶器，且陶明器模型或俑類佔了其中相當大的比例，反映出東晉少數等級較高墓葬仍流行以大量的陶明器陪葬，但基本不見任何青瓷明器模型或俑類。

鎮江地區五十餘座東晉墓多數無法判明是否曾遭盜掘或擾亂，但墓葬遺物中明顯以青瓷較普遍，且近半數墓葬只出土青瓷，不見陶器。個別墓葬所出青瓷多在十件以下，部份墓葬青瓷達十多件，目前還不見青瓷超過二十件的墓葬。

太湖地區五座東晉墓亦以青瓷較流行，墓葬多經盜擾，僅吳縣楓橋何山墓保存完整，該墓計出土陶器二件，但青瓷則有

二十七件，醬褐釉瓷六件。揚州地區十二座東晉墓中，除胥浦太和六年（三七一）墓、胥浦四號墓和邗江甘泉六里一〇九號墓曾見少量陶器外，一般只出土青瓷。但青瓷數量不多，所見者均在十件以下。

觀察東晉墓所出陶瓷，除了屋、車、憑几、案几或人俑等陶質明器較吳至西晉時增多，其餘流行於吳至西晉墓的圈欄模型類已基本消失。所出青瓷多屬實用器皿類，除了南京或太湖地區少數幾座等級較高墓葬曾出土較多青瓷，一般墓葬所出青瓷均在二十件以下，與西晉時期有所不同。

南朝時期

四十六座南朝墓分布於南京、鎮江和揚州等地區。南京地區三十八座南朝墓所出陶瓷不僅數量較前代明顯趨少，器形種類亦較貧乏。個別墓葬所出青瓷多在十件以下，若干墓葬甚至只見陶器，不見青瓷。青瓷作品且集中於碗、盞、壺、罐等推測屬實用器皿類，不見任何可確認屬明器範疇的青瓷製品。陶器出土數量不一，部分墓葬如仙鶴門墓、中華門外板橋鎮墓、堯化鄉堯辰村墓、堯化鄉前新塘村墓、童家山墓和西善橋宮山墓所出陶器均超過二十件。陶器類如屋、車、憑几、人俑繼東晉持續生產，但陶人俑出土頻率和數量大幅提高，如中央門外小洪山墓出土八件陶人俑，童家山墓和西善橋宮山墓均出土六件，仙鶴門和胡橋吳家村亦各出土四件人俑。

鎮江地區五座南朝墓多不見陶器，但青瓷數量亦極少，均在五件以下，器形亦只見碗、壺、罐等少數幾類。揚州地區兩座南朝墓均遭盜擾，其中邗江二號墓出土五件陶器另一件釉陶。

儘管南朝墓有許多已經盜掘，不過結合若干保存完整的墓葬出土陶瓷可以明顯地看出，青瓷較東晉時衰退，個別墓葬所出青瓷多在十件以下。除了部分墓葬只出少量青瓷而又不見陶器外，多數墓葬所出陶器均在十件以下，少數墓葬出土陶器達二、三十件，其器形種類包括俑、憑几、牛車以及耳杯、榻、盤、薰、罐、盆等各類，而以具實用器皿造型作品為數最多。

三、小 結

由於江蘇六朝墓出土青瓷的產地歷來有所爭論，它們除有不少來自著名的浙江省越窯產品，推測還有部分來自浙江德清

窖【註二五九】、葵窖【註二六〇】或江西省瓷窖所生產【註二六一】。此外，依據當地研究者所言，太湖地區宜興周墓墩或鎮江地區晉墓所出作品有不少可能來自宜興均山窖所產【註二六二】。因此，目前還無法結合江浙地區有限的六朝窖址發掘資料，針對江蘇六朝青瓷的消長做進一步有意義的闡述，而只能就其可能因某種先天因素或後世盜擾，屢雜若干偶然性質的墓葬出土資料進行初步考察。儘管如此，墓葬出土陶瓷亦清楚地表明：江蘇六朝青瓷以西晉時最爲流行，東晉次之，東吳時期則以陶瓷較流行。造成東吳墓陶器較多的現象，是由於當時流行以大量的陶明器模型或俑類陪殉入壙，西晉時雖有部分明器模型以青瓷爲之，不過形成青瓷遠多於陶器這一情形的原因，仍在於青瓷器皿類數量的大幅增加，其與浙江省吳墓出土陶瓷多屬青瓷製品陶器極少見到的組合特徵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過去羅宗真氏主張江蘇東吳青瓷已逐漸代替銅器，漆器和陶器，若干墓葬青瓷以明器爲主的看法【註二六三】，應止於個別現象，似不宜一概而論。東晉時各地區墓葬亦以青瓷較常見，但就如李蔚然氏所指出，南京地區東晉墓出土較多陶明器【註二六四】。值得留意的是這一情形並不見於其他地區東晉墓，若結合其墓葬形制和其他伴隨遺物等情形看來，部分南京地區出土較多陶明器的東晉墓墓主身分等級均較高，並包括有若干推測屬帝王陵寢者，反映出當時貴族仍流行以陶製明器入壙。不過，一般而言，各地區東晉墓均以青瓷數量較多，特別是鎮江地區確如劉建國氏所言，遺物中以青瓷佔最多數【註二六五】。若結合前述從時代變遷所見個別器類的材質變化，若干於西晉墓以青瓷爲之的作品，至東晉時已由陶器所替代，且東晉墓已基本不見西晉時常見的青瓷數量遠多於陶器，比例懸殊的例子，不難看出東晉青瓷已不如西晉流行。此外，於東晉時器褐釉瓷則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計二十餘座東晉墓都曾出土，東晉時期這一趣味上的轉變，值得加以留意。

伍、出土陶瓷組合和墓葬形制、規模的關係

江蘇六朝墓形制多樣，就其平面設計而言，除了有呈雙凸形的前後雙室墓、呈品字形的三室墓、或前後雙室帶側室的十字形墓以及前後室帶耳室等多室墓外，還有最爲常見的單室墓等。單室墓平面又有呈刀形、凸形的帶甬道墓以及無甬道的長

方形墓或無甬道單耳室墓等。墓絕大多數以磚砌築，墓頂有券頂，穹窿頂以及較少見的平頂墓之分；墓壁多呈直壁，南朝以來的則略向外弧。土坑墓較少，瓮棺墓則極少見到。墓規模大小不一，既有長達十米以上的大墓，也有僅够容身三米以下的小墓。

如果說墓葬規模大小或形制是墓主生前財富、地位的反映，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各個時代和相異地區的不同葬俗，那麼將墓葬出土陶瓷組合及其他伴隨遺物結合墓葬規模進行觀察，將有助於理解不同階級墓主於墓葬中陶瓷的使用狀況。事實上，為數衆多的江蘇六朝墓中即包括部分可確切判明或可大致推測墓主身分的墓葬，這就為我們進一步理解各型墓葬墓主可能的身份地位提供重要線索。

墓葬分型基本以其規模大小為基準，包括甬道全長六米以上為大型墓，四米至六墓間為中型墓，四米以下屬小型墓。不過，各時代的小型墓均較少，推測可能與其出土文物一般不甚豐富，較少見諸報導的人為因素有關。此外，部分年代不易確定的江蘇六朝墓，或若干於發掘報告書未記明墓葬形制、規模的墓葬，在此則不予討論。

一、各型墓葬和墓主等級關係

過去的研究者亦曾對南京及其鄰近地區六朝墓的形制、規模和墓主關係進行討論。其中又以中村圭爾氏將墓葬形制、規模結合已知墓主之籍貫、等級、南北人問題所做的細密考察最值得留意。依據中村氏的看法，就墓葬形制而言，作為本文大型墓主要形制的前後雙室墓均集中於吳至西晉時期，東晉以來除少數例外絕大多數墓葬均屬單室墓，由於北人上層階級南渡集中於東晉成立的三一七年前後，故同氏推測多室墓墓主應屬東晉以前南人豪族，北人墓則多採單室墓。其次，同氏又以單室墓之墓室規模為基準，認為室長六米寬三米以上的屬大型墓，其等級相當於帝、王陵；未滿六米含甬道全長五、六米間（包括若干室長五米，全長達九米的墓葬）為中型墓，墓主多為南下北人貴族；以下則屬小型墓【註二六六】。

截至目前，考古發掘尚未有可判明墓主身分的吳墓出土。不過就可判明墓主身分的西晉墓而言，宜興周墓墩一號周處墓（贈平西將軍）、二號周札墓（周處子，會稽內史）、三號周靖墓（周處子）、四號周魴墓（吳都陽太守）和六號周賓墓（

周勰父，郡守）等南方豪族義興周氏家族墓均爲大型墓，並且除了六號周賓墓外均爲多室墓。其次，官至汝陰太守本籍廬江的南京中華門外板橋鎮永寧二年（三〇二）侯氏墓亦屬大型多室墓。此外，吳縣獅子山廬江太守東明亭侯墓（M二）及其家族墓（M一、M四）亦均爲大型多室墓。儘管東明亭侯墓墓主的比定尚有爭議，目前存在有北地傳雋【註二六七】，以及東晉以前定居江南的南人墓主等不同的看法【註二六八】，不過就目前的資料來看，多室墓確如中村氏所指出均集中於吳至西晉，是當時大型墓採行的一般形制。結合西晉已知墓主身分，則西晉大型墓的墓主包括了江南豪族義興周氏家族的主要成員和若干官僚階層。

可判明或大致可推測出墓主身分的東晉墓出土較多。其中，推測屬帝王或其家族陵墓的有南京富貴山墓（恭帝沖平陵）、幕府山一號墓（穆帝永平陵）、汽輪電機廠墓（穆帝司馬聘陵）和南京大學北園墓及五塘村墓（推測爲司馬皇族成員）等。上述帝王及其家族陵墓一律屬大型墓。

皇族之外，老虎山顏氏家族墓中的二號顏緝墓（平西侯顏髦子）、三號顏約墓（東陵太守）、四號顏鎮之墓；或同爲北方高級士族的南京雨花臺謝鯤墓（豫章內史）、溧陽謝琰墓（常侍、給事中）、南京司家山謝球夫婦墓（謝球官至輔國參軍，妻王德光爲王羲之孫女），以及宜興周墓墩五號墓等亦均爲大型墓。從而得知，東晉大型墓墓主身分包括帝王皇族，以至北方高級士族和江南土著豪強義興周氏成員。

東晉中型墓可以南京象山（人臺山）瑯琊王氏家族墓爲例。該墓羣計發掘九座，其中除象山東南郭家山永和三年（三四七）三號墓屬大型墓外，其餘均爲中型墓。就可判別墓主身分的墓葬而言，象山一號王興之墓（征西大將軍行參軍贛令）、三號王丹虎（都亭肅侯王彬女）、五號王閭之（王彬孫）、六號夏金虎（王彬繼室）、七號王虞（王彬兄）。就如中村氏所指出，象山王彬及其家族成員，有的並無任何官職，任官者的也僅止於縣令程度職位不高，依其世系而言，王彬一支屬君臨南朝王氏主流中的傍支，△南齊書·王僧虔傳▽：「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王興之等人或爲較王氏本流屬劣等門第居住於烏衣巷中的烏衣郎之一【註二六九】。象山王氏墓之外，無官職的江寧縣太元十三年（三八八）卞氏王夫人墓或象坊村大興二年（三一九）朱君妻吳氏墓亦屬中型墓。從而可推測東

晉中型墓墓主包括南朝北人次級士族及其家族成員。

經正式發掘且出土有陶瓷的南朝大型墓於已發表的南朝墓葬中佔有相當大的比率。其中有部分墓葬被比定為王陵或其家族成員。如西善橋油坊村墓（陳宣帝顯寧陵）、丹陽胡橋墓（南齊景帝修安陵）、丹陽建山金家村墓（南齊東昏侯蕭寶卷陵）、丹陽胡橋吳家村墓（南齊和帝恭安陵）、南京甘家巷六號墓【註二七〇】（梁安成康王蕭秀墓）、甘家巷四號墓（蕭秀家族墓）【註二七一】。其次，南京蔡家塘一號墓主被推測有可能為蕭憺或其子蕭曄；堯化門梁大通四年（五三二）墓推測或為梁昭明太子蕭統安寧陵或武帝之子蕭偉墓【註二七二】。上述墓葬中除甘家巷四號墓和蔡家塘一號墓全長九米餘，其餘墓全長均在十米以上十五米以下，推測類似規模的墓葬墓主應為皇族成員。

可判明墓主身分的南朝中型墓，目前僅有宋元徽二年（四七四）明曇懷墓。明氏曾任寧朔將軍、員外郎、縣令，推測該型墓墓主或多為南朝中下官僚階層。

限於目前可判明墓主等級的墓葬仍然不多，墓葬規模的區分亦帶有相當程度的主觀成見，可能會因人而異，特別是如過去研究者所指出，墓葬構成的要件尚包括封門牆、墓門、壁龕、排水溝及其墳丘狀況、埕域或構築墓室時的總排土量所費勞動力等等，因此本文的區分標準無疑是極其簡陋的。不過就已知墓主身分結合其墓葬規模所進行的初步考察中，仍可大致看出西晉大型墓和東晉、南朝大中型墓主的可能所屬階級。至於小型墓則由於缺乏可資判別墓主身分的地券、墓志等遺物，其墓主等級只能從已知的大中型墓進行間接的比較推敲。就這點而言前文所敘及的墓葬出土陶瓷組合，以及將於以下討論的從各型墓葬出土遺物的比較所反映的各型墓葬墓主的經濟能力，就可提供若干有益的線索。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小型墓墓主可能是包括若干下級官僚在內的一般庶民階層。過去町田章氏曾將南京六朝墓劃分為王陵級大墓、中型南朝有力貴族墓、小型中級官僚墓和下級官僚及庶民之僅够容身豎穴磚墓等四型【註二七三】，然而並未列舉實際例證，詳情不得而知。近年來馮普仁氏墓則將南朝磚墓規模區分為帝王級墓（全長十三、十五米）、王侯級墓（全長七米、十米）、官僚士族墓（全長四、七米）、平民墓（全長四米以下）等四型【註二七四】，其結合已知墓主身分等級所做的考察雖具參考價值，不過江蘇六朝各型墓葬墓主問題仍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而墓葬出土陶瓷及其他伴隨遺物則為其中的重要線索之一。

二、各型墓葬出土陶瓷組合及其他伴隨遺物

東吳時期

這一時期大型墓均屬多室墓，而以雙凸形前後雙室墓最常見，其中江寧天冊元年（二七一）一號墓、郭家山永安二年（二五九）墓和鄧府山墓等另帶耳室；揚州胥浦七〇號墓則呈品字形三室墓。就東吳該型墓出土陶瓷而言，每墓均出土青瓷，未經盜擾墓葬出土青瓷數量從五件以上至十數件不等。種類除碗、盞、鉢、盃、盂、帶繫罐、盤口壺、穀倉罐、虎子、蛙盃之外，還可見到目前不見於同期中小型墓的唾壺、盆、洗、簋、扁壺、鳥飾燈、提梁薰和井、灶或禽舍等明器模型。陶器出土數量較多，近半數墓出土陶器均在二十件以上；包括有五聯罐、帶繫罐、薰爐、燈盤、鉢或動物俑、禽舍、井、灶等，並有不見於中小型墓的陶車、屋、船、騎馬俑、人俑、硯、果盒、壘等。

就大型墓陶瓷以外的伴隨遺物而言，以銅鏡和銀釵、銀環等最常見。其次金飾、石黛硯、漆器、銅器皿、鐵兵等亦可見到，個別墓葬如南京板橋公社墓則見有料珠；郭家山永安二年（二五九）也出土了鐵斧、鐵舌等農具。並有部分墓葬出土磚質或鉛質地券。

中型墓均為單室墓，除帶甬道券頂墓或帶甬道及耳室墓外，另有無甬道的長方形墓等。出土陶瓷數量一般少於大型墓，青瓷種類較少，只見碗、盞、帶繫罐、盤口壺、蛙盃、甗等少數幾種，但個別墓葬曾出土穀倉罐、虎頭罐和獅形器。陶器數量不少，種類也頗豐富，如幕府山五鳳元年（二五四）一號墓、趙士岡鳳皇二年（二七三）七號墓出土陶器均達二十餘件，但多數該型墓所出陶器均少於二十件。除各式壺、罐、碗、盆、盤、薰、穀倉、燈和五聯罐外，另有不少明器模型和動物俑類。此外，南京甘家巷一四號墓出土的三件頂罐陶人俑，則是南京六朝墓中僅見的作品。

陶瓷之外的伴隨物以銅鏡最常見，近半數該型墓都有出土。長方形黛硯和地券依然可見，但銀飾、漆器或鐵刀劍出土頻率或數量均少於大型墓，金飾和銅飾件極少見，目前只見於南京甘家巷一四號墓的金環和銅帶鈎，料器和銅器皿類則不見出土。

小型墓報導最少，經確認的該型墓有南京趙士岡赤烏十五年（二五一）墓和甘家巷高場一號墓，兩墓均屬無甬道長方形單室墓，赤烏紀年墓不出陶器，只見盤口壺、帶繫罐、虎子等少數幾件青瓷；高場一號墓除出土孟、鉢兩件青瓷以及穀倉罐和疑為鎮墓獸類報告書中所謂的馬等少量褐釉陶外，另有十餘件素陶罐、鉢、明器模型和俑類，有人推測其年代亦應在赤烏之後【註七五】。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高場一號小型墓出土褐釉穀倉罐，可確認的東吳時期青瓷穀倉罐或陶五聯罐等作品均只見於大中型墓。此外，就陶瓷以外的伴隨物而言，高場一號墓除有銅鏡、鐵刀、銅錢外，還出土一般只見於大型墓的料珠。另一方面，推測屬吳至西晉時期的南京御道街標營一號小型墓亦伴隨出土有金飾、銅燈、漆盒等作品，其與高場一號墓均屬無甬道長方形墓，墓全長亦都為三、九米，看來該型全長近四米的無甬道長方形墓墓主等級身分似較高，有別於一般小型墓，可惜目前還無足夠的資料可予以明確的說明。

西晉時期

西晉大型墓的形制以前後雙室墓最常見，但亦有如南京西岡墓呈前後室帶側室十字形墓、吳縣獅子山元康五年（二九五）一號墓為前後室帶耳室；揚州胥浦元康七年（二九三）九三號墓則為十字形四室墓。此外，南京甘家巷五號墓為帶甬道穹窿頂單室墓，宜興周墓墩第三、四號墓為平面近凸形單室墓，其中又以元康七年（二九七）周處墓規模最大，全長近十三米。這一時期大型墓出土陶瓷數量最多，如南京永寧二年（三〇二）墓、西岡墓、吳縣獅子山元康五年（二九五）一號墓以及宜興周墓墩二號墓等出土青瓷均超過三十件。青瓷種類豐富，有碗、盞、盆、孟、帶繫罐、盤口壺、扁壺、穀倉罐、洗、簋、鉢、硯、提籃薰、鏝斗、瓮、雞首壺、獅形器、虎子，以及一般不見於同期中小型墓的直筒罐、羊尊、蛙孟、奩、果盒、盆、耳杯盤、倉、鎮墓獸、神獸尊和人俑。此外，不少該型墓還出土青瓷圈欄禽舍等模型。陶器方面，數量較東吳同型墓大幅減少，除宜興元康七年（二九七）周處墓、揚州胥浦元康七年（二九七）九三號墓等少數墓葬見有較多陶器，其餘大型墓隨葬陶器多於十件以下，有的甚至不出土陶器。陶器種類不多，計有座、盤、耳杯、五聯罐、穀倉罐、犀、蛟龍形俑、人俑、動物俑和明器模型，其中有的還只見於個別墓葬，並且不見於中小型墓中。

常見的陶瓷以外伴隨遺物依次有：金飾、銅鏡、鐵刀劍、青石板、銅熨斗、銅洗、銀飾、銅燈、銅鉢、銅杓、銅鼎、鐵

鏡、鐵爐、水晶片、料珠等，個別墓葬還見有銅刀、盤、盒、盆以及石座、石珠、玉璜、雲母片、琥珀珠、漆器等作品。漆器皿較少見，不過江寧縣官家山墓則出土了漆盆、耳杯、盒、碟、碗、梳、果盒等作品。此外，墓葬規模最大的義興周處墓，伴隨文物更為豐富，除銅器皿、鐵刀鏡、金飾、水晶片、料珠之外，還出土了目前不見於其他西晉墓的石座和骨器。

中型墓以平面凸形單室墓佔多數，間可見到前後雙室墓。除南京獅子山一號墓出土二十二件青瓷，其餘經確認的中型墓青瓷均在二十件以下，其中未經盜掘的南京前頭山一號墓、梅家山二號墓、雨花臺區安德門四號墓所出青瓷均不超過十件。青瓷瓷種類亦少於大型墓，計有盤口壺、帶繫罐、虎頭罐、雞壺、獅形器、虎子、穀倉罐、唾壺、硯、提籃薰、鏃斗、碗、鉢等作品，圈欄模型則僅見於個別墓葬。多數該型墓不出陶器，少數出土陶器的數量亦均於十件以下，個別墓葬所見器形有罐、鉢、人俑、蛟龍形俑、五聯罐和豬圈、灶等明器模型。此外，出土青瓷數量最為豐富的南京獅子山一號墓另出一件小釉陶壺，其與前述宜興西晉元康七年（二九七）周處墓或東晉王廙墓中的同類小罐均屬北方鉛釉陶器，於南方六朝墓中極少見到。

陶瓷以外的伴隨文物以銅鏡最常見，青石板、銅鏃斗、滑石豬次之，個別墓葬如南京梅家山一號墓曾出土銅洗、勺、爐、耳杯、斗、盆、梢和金銀飾件；南京鄧府山一〇號墓出土所謂銅鼎；南京前頭山一號墓則見有鐵盆。這一時期小型墓均為單室墓，墓頂構築有券頂和穹窿頂兩種，可確認的墓葬多為平面長方的無甬道磚室墓。青瓷出土數量均在十件以下，其中多數該型墓青瓷不超過五件，以青瓷碗、帶繫罐、盤口壺、孟、鉢等較常見，雞首壺偶可見到，但個別墓葬如南京鄧府山九號墓出土有虎子；南京衛崗墓則曾出土一般只見於大中型墓葬的簋和扁壺。絕大多數該型墓不出陶器，少數出土陶器墓葬其數量亦在五件以下，種類貧乏，目前只見罐、盆、勺、臼和動物俑等少數幾種。

陶瓷之外的伴隨文物亦以銅鏡最常見，銀鐲和銀釵次之，個別墓葬還見有銅鏃斗、碗、洗、杯、刀或鐵劍；南京甘家巷一〇號墓則可見到金圈和銅弩機，然均只為個例。

東晉時期

這一時期大型墓絕大多數為帶甬道券頂或穹窿頂單室墓，而以券頂更為常見。少數墓葬如南京戚家山太寧元年（三二三）謝鯤墓、鎮江隆安二年（三九八）墓為前後雙室墓；宜興周墓墩太寧元年（三二三）則屬前後室帶耳室十字形墓；南京大

學北園墓爲帶甬道及單側室墓。出土青瓷數量較西晉大型墓減少，器形種類有碗、盞、罐、鉢、盤口壺、盆、洗、盤、獅形器、雞頭壺、羊尊、燈、薰、耳杯、唾壺、硯、奩、扁壺、榻、博山爐、托盤以及鳥飾盆或鳥形水盂等。其中，獅形器只見於南京大學北園墓、鳥形水盂只見於南京富貴山墓、奩只見於太湖地區吳縣楓橋何山等個別墓葬。榻、博山爐、托盤目前亦只見於鎮江隆安二年（二九八）紀年墓中。個別青瓷器皿數量較多，如南京富貴山墓、鎮江第三五號墓青瓷均超過十件；南京郭家山墓青瓷碗更達二十餘件。不過明器圈欄等模型類則不見出土。

東晉大型墓出土陶器組合極富特色，並有顯著的地區特徵。相對於太湖和揚州地區大型墓出土陶器極少，南京地區出土陶器極爲豐富，如郎家山四號墓、富貴山墓出土陶器均超過二十件；汽輪電機廠墓出土陶器三十九件，南京大學北園墓陶器則達五十餘件。鎮江地區個別大型墓出土陶器亦較多，如鎮江第二六號墓陶器亦超過二十件。器形種類不少，其中南京地區以龍虎形座、長方盒或箱形器和人俑、盤、憑几、耳杯、榻等構成其組合特徵。截至目前出土有龍虎形座的五座東晉墓、以及三座出土有所謂長方形盒或箱的同期墓均爲大型墓，均集中於南京地區，且多被比定爲王陵【註二七】。應是當時王陵級大型墓具有特徵的隨葬明器。鎮江地區雖不見龍虎形座和箱形器，陶俑亦極少見，不過仍以陶盤、榻、憑几、耳杯等較常見。其中鎮江二六號墓出土九件陶倉，目前不見於其他地區。此外，個別墓葬出土的黛板、三足器、犀形獸、博山爐、羊形器等目前亦不見於中小型墓葬中。

陶瓷以外的伴隨遺物以玉石豬、石黛板、銅鏡、鐵鏡、弩機及金、銀、玉等飾件最爲常見，其次亦可見到鑲金飾、漆器皿以及玻璃、馬腦、琥珀、水晶、綠晶石、炭精、角珠等飾件或器皿。個別墓葬如南京大學北園墓曾出土青銅鳥杖頭，鎮江跑馬山一號墓更出土了珍貴的金佛像牌。

中型墓除鎮江地區咸和八年（三三三）和第二四號等少數墓葬呈雙凸前後室墓，其餘均爲單室墓。單室墓中又以凸形券頂最常見，但亦可見到凸形穹窿頂墓，以及平面呈刀形的券頂墓和平面長方無甬道單室墓等。除了南京象山七號王廙墓各出三十餘件青瓷和陶器外，四十餘座東晉中型墓所出青瓷或陶器均於十件以下。就未經盜擾的墓葬而言，南京地區該型墓所出

青瓷或陶器多爲十件左右，但揚州地區數量則較少，出土陶瓷總數均不超過十件。青瓷作品以碗、盞、盤、罐、雞頭壺、唾壺、盤口壺最爲常見，間可見到虎子、羊首壺、樽杓、水盂和帶流尊等。除少數墓葬之外陶器出土數量不多，且有近半數墓不出陶器。陶器種類以盤、憑几、耳杯、硯、榻等較常見，部分墓葬亦曾出土車、甗、灶、碗、座、燈、鉢、盆、樽杓或人俑、牛俑、馬俑等，其餘困、勺、井、枕、屋、托盤、唾壺、豬等目前只見於個別墓葬。

陶瓷以外伴隨遺物頗爲豐富，包括有金、銀、銅、鐵、鑲金、玉、石、料、漆、骨和各種貴重飾件。其中又以銅鏡、鐵鏡、石豬、石板、水晶珠和各式金銀飾最常見；部分墓葬還見有銅弩機、鏃斗、削、碗、唾壺、博山爐、印、鐵剪、刀、骨管、漆器以及馬腦珠、琥珀珠、綠松石珠等。此外，個別墓葬如南京象山七號王廩墓出土了金剛石指環；王興之夫婦墓出土有鉛人和鑲銅的所謂鸚鵡杯。【註二七八】

小型墓較少，可確認者只有十餘座，均爲單室墓，除平面呈凸形的券頂墓外，另有平面長方無甬道墓，揚州地區小型墓多屬後者。此外，偶可見到土坑豎穴墓。小型墓出土陶瓷數量較少，且多數不出陶器，部分出土有陶器墓葬亦僅一、二件，器形僅有硯、托盤、盆、吊桶等少數幾種。青瓷各墓均有出土，然數量亦不多，多在十件以下。器形包括硯、唾壺、雞頭壺、虎子、盤口壺和罐、盆、鉢、碗等。此外，鎮江四號墓出土了一般只見於大中型墓的羊形器。

小型墓一般不出其他伴隨遺物，但偶可見到石豬陪殉入塋，個別墓葬亦曾出土銅鏡、鐵鏡和銅弩機，不過較爲少見。

南朝時期

南朝大型墓均爲平面略呈凸形的帶甬道單室墓。該型墓集中於南京地區，揚州地區亦出土一座，其餘鎮江、太湖、洪澤湖等地區不見出土。該型墓多經盜掘擾亂，各墓所出青瓷多在十件以下，南京江寧吉山出土青瓷最多，但亦只十五件。結合推測未經盜掘保存較完整的棲霞區堯化鄉堯辰村墓亦只出兩件青瓷另四件褐釉作品，推測南朝大型墓青瓷數量均較前期顯著減少。青瓷種類亦不多，計有盤口壺、唾壺、罐（含蓋罐）、蛙盃、盞、鉢、碗、硯、盤、雞頭壺、燈等少數幾種。出土陶器數量比數懸殊，既有不出陶器者，又有出土陶器達三十餘件墓葬，但多數墓葬所出陶器多於十件以下。器形包括罐、碗、盞、盆、硯、盤、薰、榻、灶、倉、人俑、犀形獸、勺、牛車、憑几、耳杯、帶蓋罐和盤口壺等，並有目前只見於大型墓的

盒、插器、屋、托盤、座、甗、盂、耳杯、燈、鏹斗、鉢、碟、直筒小罐、豬圈和鷄、羊、馬等象生模型。而以俑、盤、罐、槨、憑几、燈、盒、耳杯、薰、屋、座等構成其基本組合。

陶瓷以外的伴隨物以石器最爲突出，計有石豬、俑、馬、馬槽、板、祭臺、座、憑几、案足、柱和獸等，而以石豬和石俑最常見。此外，偶可見到少量金、銀、玉飾、銅環等，個別墓葬如丹陽胡橋大墓伴隨遺物較多，除石俑、板、鐵兵、金飾、玉飾之外，還見有料珠、馬腦珠、琥珀珠和水晶珠等。

中型墓多爲平面凸形的單室墓。各墓所出青瓷均於十件以下，器形種類較少，較常見的有碗、盞、罐（含蓋罐）、唾壺和盤口壺等，個別墓葬另見有盤、洗、硯和柱盤三足器。陶器數量不一，未經盜擾墓葬所出陶器從十件以下到二十餘件不等。作品種類以人俑、罐、憑几、盤、耳杯、勺、碗和帶蓋罐較常見，犀形獸和灶偶可見到，個別墓葬還出土了盤口壺、薰、車、奩、柱形盤、硯、井、倉等作品。

中型墓陶瓷以外的伴隨文物不多，以石豬最常見，銅鏡次之，但個別墓葬可見到石獸、銅鈴、鏹斗、耳杯、爐、鐵刀或金、銀釵環等飾件。

南朝小型墓報導最少，可確認屬該型墓葬者不滿五處，且均不出土陶器。青瓷種類貧乏，目前只見碗、盤口壺、鷄頭壺和直筒罐等少數幾種，目前亦不見陶瓷以外其他伴隨遺物。此外，於泰州地區還見有以青瓷爲葬具的甕棺葬，該式葬俗極爲簡陋，目前不見其他伴隨遺物。

陸、結語

總結以上論述，不難看出碗、盞類是江蘇六朝各期墓葬共通的、也是最爲常見的陶瓷作品，它與各式壺、罐、鉢等構成吳至西晉墓葬陶瓷的基本組合。與上述具有日常生活器皿造型相對的，陶製明器模型和動物俑則是東吳墓陶瓷中另一重要組合。西晉墓陶明器已漸趨衰退，但出現了不少犬欄、羊圈等青瓷模型；而西晉墓中的鷄首壺、唾壺、硯或獅形器等青瓷作品

也較吳墓多見。東晉墓陶瓷除碗、盞之外，以各式壺、罐、盤或硯、憑几、鉢、耳杯、薰爐、燈和人俑較常見，壺罐類中常見於吳至西晉的雙繫罐趨少，但盤口壺、薰爐、鷄首壺、耳杯或所謂榻的分格盤明顯增多。此外，流行於吳至西晉時期的陶五聯罐或青瓷穀倉罐於東晉時已基本消失；模倣動物造型的獅形器或虎子亦較少見，不過羊形器則較前期常見。明器模型除少數幾類作品外，基本不見於東晉墓，值得留意的是憑几和牛車則大幅增多，反映出當時貴族生活的一個側面。南朝墓出土陶瓷種類最少，但近半數墓葬都出土了陶人俑，明器模型除憑几、車、屋等仍繼東晉繼續生產外，其餘作品基本少見，不過出現了大形蓮花尊這一具有時代特徵的作品。

儘管墓葬所出陶瓷組合可能因某種先天因素或後世盜掘，難免靡雜若干偶然性質，不過就目前各期墓葬出土陶器與青瓷的數量，或將各期僅出青瓷或青瓷多於陶器的墓葬，與僅出陶器或陶器多於青瓷墓葬予以比較，可知江蘇六朝青瓷最流行於西晉，東晉次之，東吳時除少數墓葬之外，一般以陶器較流行。造成東吳墓陶器多於青瓷這一現象，則是由於東吳時期流行將許多明器模型或動物俑類陪殉入墳，而這類明器多數均以陶器爲之。此外，江蘇六朝墓所出陶瓷還包括部分施黑釉或醬褐釉作品，而以東晉最流行。經報導的三三〇座墓中初步估計三十餘座都有出土，其中半數以上出於東晉時期墓葬。就該類作品的器種而言，計有帶繫罐（雙繫、四繫、六繫）、碗、盞、鉢、甕、小壺、鷄首壺、盤口壺、唾壺、蛙尊、鳥飾盆、燈、薰、馬俑和穀倉罐等，而以鷄首壺和唾壺最爲常見，這固然與鷄首壺和唾壺流行於東晉且東晉時黑釉瓷產量大增一事有關，不過若結合前述六朝墓所出若干器形僅見青瓷，或只見陶器等情形看來，似乎可以再次肯定六朝陶瓷製作確是出現了因應不同用途，或若干特定的器形而有意識地選擇不同的材質來生產加工。

其次，若將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與長江中下游諸省同一時期墓葬陶瓷進行比較，不難看出江蘇六朝墓陶瓷不僅數量多，器形種類也最爲豐富。特別是首都健康（南京）大量墓葬所出豐富的隨葬品，不僅反映了當時首都繁榮的經濟和較高的陶瓷消費能力，部分王陵級大墓所出陶龍虎座等作品更是不見於他省的具有等級象徵的隨葬器物。此外，個別器形的出現、流行時代或造型、裝飾特徵各省之間亦不盡相同。如就不見於江蘇地區的組合特徵或個別器類而言，湖南吳至西晉墓流行陪葬青瓷人俑【註二七九】；湖南、江西福建南朝墓的青瓷長頸圓腹瓶；江西、福建兩省南朝墓常見的五盅盤，以及福建南朝墓中的

單管、四管青瓷插器等均是江蘇六期墓陶瓷所不見的器形或組合特徵【註八〇】。而流行於江蘇吳至西晉時期的青瓷虎子，於同省東晉墓已趨少，至南朝時基本不見，於福建地區雖遲至西晉墓才可見到，然而却較流行於南朝，並且晚至隋唐墓中仍可見到，其流行時期和造型裝飾特徵與江蘇地區頗不相同【註八一】。至於浙江六期墓陶瓷除了絕少出土陶器而以青瓷佔絕大多數與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組合有較大差距之外，兩省青瓷作品無論在種類、流行時期或造型、裝飾特徵都頗為一致，這除了反映三吳地區（吳興、吳郡、會稽）有較為相近的風俗民情，也應與該地區水路暢通，交通便利，不少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即來自浙江越窯系等瓷窯所生產一事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各省的開發程度、經濟發展及其所帶來的陶瓷消費狀況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不過就目前已發表的資料而言，各省東晉墓基本少見或不見流行於吳至西晉時期的明器模型，而江蘇省常見於吳至西晉時期的多室墓至東晉時亦為單室墓所取代【註八二】，種種跡象似乎都顯示六朝葬俗於東晉時有了較大的變化。過去魏鳴氏曾撰文考察魏晉葬制，認為曹魏、西晉北方地區和東晉一脈相承薄葬，孫吳和西晉南方地區則游離於魏晉薄葬主綫之外流行厚葬，南方西晉墓多承襲孫吳厚葬遺風，至東晉偏安江南，南方地區自東漢以來的葬俗因受中原薄葬風氣影響而產生了變化【註八三】。儘管東晉墓如推測屬帝王陵的南京大學北園墓或象山王氏家族墓，除出土大量陶瓷，另伴隨許多金、銀、水晶、瑪瑙、玻璃等珍貴物品，文獻所見為政者三令五申嚴禁厚葬一事【註八四】，對於當時王公貴族而言往往只是一紙具文。不過就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的組合變遷看來，在相當程度上的確是反映了吳、西晉流行厚葬，至東晉時期明器模型極為少見而有所儉約這一葬俗趨勢。東晉葬俗的變化，除與當時的思想背景有關，似乎又與北來僑姓貴族已凌駕江南土著豪族並確立其體制上主導地位的政治局影響力有所關聯。

註 釋

【註一】：上述墓葬數據是筆者依據已公開發表材料的初步統計，推測實際的數目當不止於此。如南京地區至一九五九年止，已發掘的六朝墓不下二三〇座（南京

博物院、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省博物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曾昭燏）一九六〇、五頁）；至八十年代初期，同地區已清理的六朝墓更多達二〇〇座（李蔚然一九八四、三一五頁）。另據羅宗真的統計，至一九八〇年止，江蘇省隨葬有瓷器的六朝墓計二一〇座，出土青瓷總數達八百四十餘件（羅宗真一九八四、一二八頁）。此外，據報導，一九五四年發掘無錫壁山莊（烏龜墩和長腰墩）及仙蠡墩時，曾發現漢至六朝墓二十六座，除出土陶器等文物外，還伴隨有西漢五銖、貨泉、大泉五十、大黃布千等貨幣，報告者因此推測可能屬漢代墓葬；但其中的木頂磚室墓時代最遲者要晚至漢末至六朝，而三處遺址當中又以長腰墩墓葬時代最晚（朱江一九五五、二七一—三〇頁）。據筆者觀察報告書所載圖版，除圖版伍之一——六的雙耳罐或釉陶盂有可能屬六朝時期作品但尚待確認外，其餘文物多具漢代特徵，因此上述無錫二十六座所謂漢至六朝墓，暫且不予列入計算。

【註二】：此外，據南京博物院等（曾昭燏一九六〇、五頁）稱江北的淮安、海州、徐州等地亦曾發現六朝墓，南京博物院的研究人員也提到蘇北建湖、徐州、連雲港亦發現六朝墓葬（南京博物院一九七九、二〇八頁），然尚未有正式發掘報導，無從得知墓中是否出土陶瓷。

【註三】：南京地區墓葬大致分布於中華門（鄧府山、丁甲山、郎家山、英台山、戚家山、板橋鎮、象坊村、涂家村、西善橋等）、中央門（幕府山、梅家山、小洪山、合班村、四板村、宋家壩、邁皋橋等）、新民門（象山、人台山）、光華門（趙士岡、石門坎等）、挹江門（老虎山、童家山等）、仙鶴門（呂家山、張家庫）、堯化門、棲霞山（甘家巷、蔡家壩、前頭山）、江寧縣（殷巷、黃家營等）、郭家山及其北郊五塘村、太平門等。其次，清涼山、鎮金村、高家山、標營御道街、東北郊西崗、富貴山、東郊馬羣、對門山、石子岡砂石山、通濟門、上坊、六合、東山、大樹城和南京大學北園亦有少數出土。不過應該說明的是，上述地名之所屬多係依照發掘報告書的記述，少數由筆者查閱所得，然由於各發掘報告書之記載詳簡不一，且筆者對於南京地區目前的細部地域歸劃並不清楚，因此或有若干重複、漏列或誤列之處，均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補充修正。

【註四】：鎮江地區六朝墓計分布於鎮江、句容、溧陽、金壇、丹徒、丹陽、常州、武進和高淳等地。

【註五】：太湖地區六朝墓計分布於宜興、吳縣、無錫和蘇州等。

【註六】：其中，高淳化肥廠一號墓及句容寶華陸家院於報告書中均記為「屋圈」或「禽屋」（鎮江博物館（劉建國）一九八四、五三〇頁圖四8——9、五三三頁圖七之6參照）。觀察報告書的附圖，其陶屋前雖未置雞，然從陶屋之構築特徵看來應為雞埒。

【註七】：羅宗真一九九四、一三一頁。

【註八】：鎮江博物館（劉建國）一九八四、圖版伍之2。

【註九】：鎮江博物館（劉建國）一九八四、圖版伍之3。

【註一〇】：南京博物院等一九六三、圖二二六——八。

【註一一】：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九七六、三三四頁。

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組合特徵及其有關問題（上篇）

【註二二】：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九七六、圖版玖之5。

【註二三】：常州市博物館、金壇縣文管會（徐伯元）一九八九、七四頁圖二四、七五頁圖一九、七七頁圖二六。

【註二四】：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九七六。不過應該說明的是報告書三二〇頁稱該墓出土一件褐色釉雙繫瓷罐（圖版捌之1），然同報告書三一九頁所附實測圖（圖七）則將上述雙繫罐列為青瓷。從圖七所列各圖器形品名有誤植顛倒情形推測，應以圖版捌之1所載為是。

【註二五】：金璫一九六三所記褐釉作品計包括內置陶碗、陶杵、陶箕等之大鉢（三〇四頁、圖三）、雙繫罐（三〇四頁、圖五右）、飾佛穀倉罐（圖版叁之2）及所謂的「馬」（圖版叁之5左）。此外，鎮江丹徒葛村一號墓（鎮江博物館（劉建國）一九八四、五三一頁）據稱亦出土了褐釉唾壺，但所載圖版說明則記為青瓷（五三〇頁圖四之7、五三三頁圖六之11、另五四五頁表一），因此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證實。

【註二六】：此外，丹陽縣胡橋大墓亦出土「陶俑」，可惜由於報告較簡略又無圖版，是否為人俑不明（參見南京博物院一九七四、四六頁）。

【註二七】：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一〇七。

【註二八】：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一〇五——六。

【註二九】：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魏正謹、阮國林）一九八〇、二六頁圖四。

【註三〇】：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七、七〇頁圖五一。

【註三一】：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一〇九。

【註三二】：過去魏正謹、易家勝兩人曾將南京出土六朝青瓷區分為生活器皿、日常用器、文房用具、魂瓶和明器等五大類（魏正謹、易家勝一九八三、三四七——五三頁）；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一九六六、二〇三頁）或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博物館（朱蘭霞）一九八三a、三二〇頁）的研究者於發掘報告書中亦曾以日常器皿類和明器等兩大類區分之。但上述分類法中，日常器皿與明器之區分過於籠統，而魏氏等人的分類亦有待商榷，如所謂的生活器皿類和日常用器類即涵義曖昧不易區分，且日常用器類包括有虎子、文房用具類包括有羊形器、獅形器等用途尚有爭議的作品；至於所謂的魂瓶事實上僅屬明器中的一個器種，將之獨立另列一類並不恰當。

【註三三】：朱伯謙一九八一、一八〇頁。

【註三四】：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九四。

【註三五】：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九三。

【註三六】：鎮江博物館（劉建國）一九八四、五二八——四五轉五一四頁。

【註三七】：南京市博物館（袁俊卿）一九七二、二四——四一頁。

- 【註二八】：南京博物館（郝明華）一九八七、二〇三——六轉二〇二頁。
- 【註二九】：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九三；南京市博物館（阮國林）一九八三、三三三頁圖二右上。
- 【註三〇】：南京市博物館（周裕興）一九八八、七九頁圖七。
- 【註三一】：揚州博物館（吳煒）一九八四、二四七——八頁。
- 【註三二】：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李鑑昭）一九五六、一三頁圖一五——六。
- 【註三三】：王志敏一九五六、一三頁圖一七。
- 【註三四】：南京市博物館（袁俊卿）一九七二、三八頁圖二。
- 【註三五】：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一九七三、四九頁圖一五。
- 【註三六】：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二五頁圖一五之11、圖版肆之21。
- 【註三七】：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李鑑昭）一九七六、五〇頁圖二之5。
- 【註三八】：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a、圖版陸之1。
- 【註三九】：南京博物院（李文明、錢鋒）一九八五、圖版伍之5。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九六〇年、四二頁圖二〇左。
- 【註四〇】：常州市博物館、金壇縣文管會（徐伯元）一九八九、七七頁圖二八。
- 【註四一】：金瑤一九六三、圖版叁之2。
- 【註四二】：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圖版壹之4。
- 【註四三】：（阮國林）一九八五、一三八頁。
- 【註四四】：過去魏正謹等研究者曾主張「方壺」是東晉時始出現的器種（魏正謹、易家勝一九八三、三五〇頁），所謂的「方壺」不知所指為何？若係指扁壺則與出土資料不符。
- 【註四五】：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張志新一九八〇、圖版拾陸之3。
- 【註四六】：金瑤一九六三、三〇五頁圖八之1、圖版叁之1。
- 【註四七】：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化館、宋捷、劉興（一九七六、九九——一〇〇頁；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版一八。
- 【註四八】：羅宗真一九五七、圖版叁之3。
- 【註四九】：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二七。

【註五〇】：關於這類器物的討論可參見孫機一九八〇、八一頁、黃盛璋一九八三、三二——六頁；孫機一九八六、四八——五一頁。

【註五一】：鎮江博物館（劉建國）一九八四、五三〇頁圖四之6、圖版伍之2。

【註五二】：謝明良一九九〇、一一〇——一九頁。

【註五三】：鎮江博物館（劉建國）一九八四、五三〇頁圖四之2、圖版伍之3。

【註五四】：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七、一四頁圖七。

【註五五】：屠思華、李鑑昭一九五六、一五頁圖三。

【註五六】：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三九頁圖二之13。

【註五七】：華東文物工作隊（蔣續初）一九五六、圖二三。

【註五八】：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李鑑昭）一九五六、一二頁圖一四；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朱江等）一九五七、一八九頁。

【註五九】：該作品亦曾刊載於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七、六八頁圖四九右，定名為「天鵝壺」，筆者同意這個看法。

【註六〇】：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九八。

【註六一】：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一八頁圖五之17、三九頁圖二之11。

【註六二】：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棲霞山甘家巷第四號南朝墓曾出土所謂的「蛙盃」（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九七六、三三四頁），可惜報告書未載圖版，詳情不得而知。不過一九七三年浙江省吳興縣環溪南朝墓曾出土「蛙形水盃」，然整體呈蛙形，並於蛙背置一圓孔（朱伯謙一九八一、圖一〇參照），與本文所稱蛙尊無涉。甘家巷第四號南朝墓所出作品是否係蛙形水盃？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

【註六三】：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三九頁圖二之10。

【註六四】：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二五頁圖一五之11、圖版肆之21。

【註六五】：湖北省見湖北省文物工作隊一九五七、六九頁圖一；湖北省博物館（王善才）一九六五、圖版叁之3（以上為同伴作品）；湖北省文物管理處（郭佳）一九五九、圖版陸之2；河北省見張季一九五七、圖版玖之1；河南省見（楊文和、范世民）一九八三、圖版捌之2；山東省見山東淄博博陶瓷史編寫組、山東省博物館（王恩田）一九八四、三五五頁圖三之1。此外，有關該類蓮花尊的簡短討論可參見矢部良明一九八一、七四——六頁，但矢部氏誤將前述湖北省文物工作隊一九五七和湖北省博物館（王善才）所記同伴作品，誤記為不同的兩件作品。

【註六六】：常州市博物館、金壇縣文管會（徐伯元）一九八九、七二頁圖一〇。

【註六七】：羅宗真一九五七、圖版陸之3。

- 【註六八】：屠思華、李鑑昭一九五六、一五頁圖一。
- 【註六九】：羅宗真一九五七、九〇頁表一、圖版柒之2。
- 【註七〇】：南京市博物館（袁俊卿）一九七二、三〇頁、四〇頁圖三三。
- 【註七一】：河南省參見：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蔣若星、郭文軒）一九五七、圖版肆之四；河北省參見：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黃秀純、朱志剛）一九八三、六六頁圖二二之3；山東省參見：臨沂地區文管會等（宋彥泉、林茂法）一九八九、七一六頁圖三之1、2；遼寧省參見：王增新一九五五、頁四二圖八、九；甘肅省參見：甘肅省博物館（林初驥）一九七九、六頁圖七。
- 【註七二】：夏鼎一九五七、一〇六頁。
- 【註七三】：矢部良明一九八一、四五——七頁；長谷部樂爾一九八二、三三五頁。
- 【註七四】：南京博物院（尹煥章）一九五五、二九頁。
- 【註七五】：（張寄庵、李蔚然）一九五五、一一三頁。
- 【註七六】：南京博物院（尤振克）一九八〇、七頁圖一〇。
- 【註七七】：鎮江博物館（劉建國）一九八六、圖版肆之3。
- 【註七八】：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一八頁圖五之20、三九頁圖二二之2。
- 【註七九】：南京市博物館（袁俊卿）一九七二、圖版伍之5。
- 【註八〇】：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一八頁圖五之31、圖版叁之12。
- 【註八一】：常州市博物館、金壇縣文管會（徐伯元）一九八九、七七頁圖二六。
- 【註八二】：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朱江、李鑑昭、倪振達、張寄庵）一九五七、一八八頁圖二平面圖所列出土遺物表參照。
- 【註八三】：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張志新一九八〇、一三五頁。
- 【註八四】：南京市博物館（朱蘭霞）一九八三a、三一七頁圖三之7、三一八頁圖四之10。
- 【註八五】：南京市博物館（袁俊卿）一九七二、四〇頁圖三二。
- 【註八六】：（李蔚然）一九六三、一〇八頁。
- 【註八七】：羅宗真一九五七、圖版肆之7。
- 【註八八】：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張志新一九八三、七一一頁。

【註八九】：南波一九七六、五八頁圖四。

【註九〇】：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九六五、圖版肆之4。

【註九一】：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圖版陸之2。

【註九二】：南京博物院（霍華）一九八一、一九頁圖一〇之5。

【註九三】：吳學文一九七八、一四四頁圖二之10——11。

【註九四】：（李蔚然）一九六一、二三〇頁圖一。

【註九五】：羅宗真一九五七、圖版參之6。

【註九六】：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一九七三、四八頁圖一三。

【註九七】：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張志新一九八三、七〇九頁圖三之2。

【註九八】：楊泓曾經說過：「在考古發掘中最早獲得的實物是洛陽西晉墓中的陶製品，後來陸續在江南的孫吳西晉墓中獲得了漆製和青瓷質的槁」（楊泓一九八六、二〇頁）。然就江蘇地區六朝墓而言，陶瓷槁目前只能早到西晉墓。

【註九九】：（尹煥章）一九五九、封二。

【註一〇〇】：江西省博物館（余家棟）一九七四、三七五頁圖四。

【註一〇一】：南京博物院（汪尊國）一九六二、圖版捌之2。

【註一〇二】：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六頁圖六之12。

【註一〇三】：鎮江建築水泥預製廠一號東晉早期墓曾出土這類作品，爲扁體、小底、肩立置四繫，壓印方格夾線紋（參見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一八頁圖五之3）；是目前江蘇東晉墓僅見的出土實例。

【註一〇四】：王志敏一九五六、圖一三。

【註一〇五】：（李鑑昭）一九五五、一五八頁。

【註一〇六】：南京博物院（張勛）一九八五、圖版柒之3。

【註一〇七】：吳文訊一九七三、八九頁圖三之2。

【註一〇八】：南波一九七六、圖版肆之3。

【註一〇九】：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朱江、李鑑昭、倪振遠、張寄庵）一九五七、圖版壹之4。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註一〇】：（阮國林）一九八五、一三八頁。

【註一一】：常州市博物館、金壇縣文管會（徐伯元）一九八九、七七頁圖二七。

【註一二】：葛家謹一九五六、四七轉三八頁；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七、圖三五；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二一。

【註一三】：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張志新一九八〇、一三八頁圖二一。

【註一四】：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一九。

【註一五】：東吳墓出土陶硯的實例計有南京江寧縣吳天冊元年（二七五）紀年墓（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六頁圖六之11；和鎮江高淳金山下一號吳墓（鎮江博物館（劉建國）一九八四、五三頁圖五之9、五三三頁圖七之1）。

【註一六】：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一九七三、四八頁圖一〇；揚州博物館（李則斌、吳煒）一九八八、二五頁圖三之一。

【註一七】：南京市博物館考古組（阮國林）一九八三、三二五頁。

【註一八】：南京市博物館（朱蘭霞）一九八三a、三一九頁。

【註一九】：南京博物院（李文明、錢鋒）一九八五、二五頁。

【註二〇】：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七、八六頁圖六四；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一一五。不過前者將之稱為「六足座」。

【註二一】：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一一六。

【註二二】：上虞縣文物管理所（章金煥）一九八九、一三六頁。

【註二三】：江西省博物館（程應林）一九七四、三〇頁。

【註二四】：林已奈夫一九七六、二四四—四五頁。

【註二五】：鎮江羅城¹曾出土灰白胎上施黑釉的球籠鏤孔三角形香薰（參見鎮江博物館（劉建國）一九八六、四一四頁）；此外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亦曾出土陶質鏤孔香薰，且可能帶有三足陶盤（參見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一九七三、四一頁），可惜兩者皆未載圖版，詳細造型不得而知。

【註二六】：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九七六、圖版捌、2—3。

【註二七】：南京市博物館考古組（阮國林）一九八三、圖版伍之5。

【註二八】：葛治功一九五八、圖版拾之11。

【註二九】：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二五頁圖一五之16。

【註三〇】：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二五頁圖一五之27。

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組合特徵及其有關問題（上篇）

- 【註一三一】：王德鎮一九五六、四一頁。
- 【註一三二】：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a、三三〇頁。
- 【註一三三】：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a、三三二頁圖六之9。
- 【註一三四】：南京博物院（李文明、錢鋒）一九八五、圖版伍之4。
- 【註一三五】：南京博物院等一九六三、圖一二六——七；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四——五。
- 【註一三六】：南京市博物館考古組（阮國林）三二五頁。
- 【註一三七】：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魏正謹、阮國林）一九八〇、二七頁。
- 【註一三八】：南京博物院（李文明、錢鋒）一九八五、圖版伍之1。
- 【註一三九】：金璫一九六三、三〇七頁。
- 【註一四〇】：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a、圖版陸之4。
- 【註一四一】：南京市博物館（周裕興）一九八七、六一三頁圖三之3。
- 【註一四二】：胥浦六朝墓發掘隊（吳煒等）一九八八、圖版貳壹之2。
- 【註一四三】：羅宗真一九五七、圖版肆之9。
- 【註一四四】：南波一九七六、五八頁圖五。
- 【註一四五】：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李蔚然）一九五九、二八九頁。
- 【註一四六】：南京市博物館（袁俊卿）一九七二、二七頁。
- 【註一四七】：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三四頁統計表。
- 【註一四八】：金璫一九六三、三〇七頁。
- 【註一四九】：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a、三二九頁。
- 【註一五〇】：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圖版肆之7。
- 【註一五一】：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張志新一九八〇、一三八頁圖一一。
- 【註一五二】：葛家瑾一九五六、三八頁。
- 【註一五三】：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一九八三、七一〇頁圖四之5。

【註一五四】：羅宗真一九五七、圖版叁之6。

【註一五五】：過去吳縣何山東晉墓曾出土所謂的青瓷「奩」，然呈圓筒狀、子母口、直腹平底，腹上且置四繫（報告參見南京博物院（郝明華）一九八七、二〇五頁圖四之1），與本文所指器形差別較大，故不予列入。

【註一五六】：南京博物院（李文明、錢峯）一九八五、二六頁圖三之10。

【註一五七】：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圖版陸之1。

【註一五八】：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七、八二頁圖六〇。

【註一五九】：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七、八三頁圖六一。

【註一六〇】：魏正謹·易家勝一九八三、三五〇頁。

【註一六一】：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九七六、三二四頁附錄。

【註一六二】：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一九七三、四九頁圖一八。

【註一六三】：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七、八〇頁圖五八。

【註一六四】：引自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四〇之解說。該作品係一九六六年於江寧縣秣稜公社橋南大隊出土。

【註一六五】：南京博物院（張勛）一九八五、九一二頁圖六上左。

【註一六六】：南波一九七六、三九七頁圖五之5。

【註一六七】：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四五。

【註一六八】：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一九七三、四九頁圖一七。

【註一六九】：南京博物院等一九六三、圖一二八；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六。

【註一七〇】：南波一九七六、圖版肆之1。

【註一七一】：鎮江博物館（劉建國）一九八六、圖版肆之6。

【註一七二】：魏正謹·易家勝一九八三、三五〇頁。

【註一七三】：南京博物院一九六六、圖版柒之2——3；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七九。然後者將其年代定為西晉。

【註一七四】：南京博物院一九七七、圖版陸之1——2。

【註一七五】：南京博物院一九七七、一二〇頁。

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組合特徵及其有關問題（上篇）

- 【註一七六】：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四〇——一。
- 【註一七七】：朱伯謙一九八一、圖七二之解說。
- 【註一七八】：南京博物院（尤振克）一九八〇、七頁。
- 【註一七九】：南京博物院（尤振克）一九八〇、七頁。
- 【註一八〇】：屠思華·李鑑昭一九五六、一四頁。
- 【註一八一】：（李鑑昭）一九五五、一五八頁。
- 【註一八二】：南京市博物館（周裕興）一九八七、六一三頁圖三之8、9、14。
- 【註一八三】：（李蔚然）一九六三、圖版玖之5——7。
- 【註一八四】：南京市博物館（朱蘭霞）一九八三、六五頁。
- 【註一八五】：南京市博物館（朱蘭霞）一九八三、六六頁圖一之7——8。
- 【註一八六】：胥浦六朝墓發掘隊（吳煒等）一九八八、圖版貳叁之5。
- 【註一八七】：（屠恩華）一九五五、二二一頁。
- 【註一八八】：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李蔚然）一九五九、二三五頁。
- 【註一八九】：常州市博物館、金壇縣文管會（徐伯元）一九八九、七五頁圖一九。
- 【註一九〇】：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朱江、李鑑昭、倪振遠、張寄庵）一九五七、圖版壹之5。
- 【註一九一】：中國硅酸鹽學會一九八二、一七〇頁。
- 【註一九二】：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朱江等）一九五七、一八九頁。
- 【註一九三】：南京市博物館（袁俊卿）一九七二、三九頁圖三一。
- 【註一九四】：胥浦六朝墓發掘（吳煒等）一九八八、圖版貳拾之4。
- 【註一九五】：引自王志敏·朱江·李蔚然一九五八、五頁。
- 【註一九六】：李鑑昭·屠思華一九五八、六八頁。
- 【註一九七】：南京博物院（李文明、錢鋒）一九八五、圖版伍之6。
- 【註一九八】：如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一二頁。

【註一九九】：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圖版貳之12。

【註二〇〇】：屠思華·李鑑昭一九五六、一六頁圖九；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五七、五〇頁圖三六。上述二文均將該類作品稱為「筒形器」或「筒式罐」。

【註二〇一】：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六頁圖六之10。

【註二〇二】：（華國榮、顧蘇寧）一九八八、一四四頁。

【註二〇三】：羅宗真一九五七、圖版伍1——13。此外，吳縣獅子山西晉元康五年（二九五）墓亦曾出土該類明器模型，報告書中雖未明確記明其材質，然從「牛甗」施青灰色釉以及文中稱墓葬遺物以青瓷為主，而未涉及陶器判斷，作品應屬青瓷（報告參見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張志新一九八〇、一三〇——八頁）。

【註二〇四】：南京市博物館（朱蘭霞）一九八三、六五頁。

【註二〇五】：（張寄庵·李蔚然）一九五五、一三頁。

【註二〇六】：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魏百齡）一九五七、一五頁。

【註二〇七】：葛家瑾·朱江一九五五、一二〇頁。

【註二〇八】：王志敏·朱江·李蔚然一九五八、五頁。

【註二〇九】：羅宗真一九五七、九〇頁表一參照。

【註二一〇】：羅宗真一九五七、九二頁表二參照。上述報告書曾推測墓主為周處子周靖，然據較後的報告書則主張墓主應為周札（南京博物院一九七七、一一八頁）。目前絕大多數研究者都同意後者的看法。

【註二一一】：南京市博物館（顧蘇寧、江林海）一九八九、一四〇頁。

【註二一二】：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九六五、四五頁圖一五。

【註二一三】：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李鑑昭）一九五六、一二頁圖一一。

【註二一四】：南京文物保管委員會（李蔚然）一九六一。

【註二一五】：（王德慶）一九五六、四二頁。

【註二一六】：華東文物工作隊（蔣續初）一九五六、圖一一——一二。

【註二一七】：（易家勝、張久文）一九八八、一四七頁。

【註二一八】：南京市博物館（陳兆善等）一九八九、一四九頁圖三之7。

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組合特徵及其有關問題（上篇）

- 【註二一九】：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李蔚然）一九五九、圖版伍之5。
【註二二〇】：南京博物院一九六六、圖版柒之4、7。
【註二二一】：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一九七三、四一頁。
【註二二二】：南京市博物館（朱蘭霞）一九八三a、三一七頁圖三之10。
【註二二三】：此外，據李蔚然一九八三、三四五頁稱五塘村東晉墓亦曾出土，然經正式報導的五塘村東晉墓於報告書中並未提及（報告參見 南京市博物館考古組（阮國林）一九八三、三三三——七頁）。另一九八五年於同地區發掘的東晉墓雖出土陶龍虎形座（易家勝、張久文、一九八八、一四六——七頁），但資料較新，可能並非李氏所指墓葬。
【註二二四】：羅宗真一九六三、三〇〇頁。
【註二二五】：南京博物館（尤振堯）一九八〇、七頁。
【註二二六】：南京博物館（尤振堯）一九八〇、七頁。
【註二二七】：南京博物館一九七四、四六頁。
【註二二八】：羅宗真一九五七、九四頁。
【註二二九】：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一九七三、四一頁。
【註二三〇】：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李蔚然）一九五九、二九三頁。
【註三三一】：李蔚然一九八三、三四五頁；蔣贊初一九八二、一九頁。
【註三三二】：南京博物院一九六六、二〇二頁。
【註三三三】：南京市博物館（朱蘭霞）一九八三a、三一九頁。
【註三三四】：南京博物院一九六六、二〇二頁、圖版柒之5。
【註三三五】：（屠思華）一九五五、一二一頁。
【註三三六】：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三六頁。
【註三三七】：（顧蘇寧、張久文）一九八八、一四七頁。
【註三三八】：屠思華、李鑑昭一九五六、一四頁。
【註三三九】：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陳福坤、尤振堯）一九六六、圖版拾之7。

- 【註二四〇】：常州市博物館、金壇縣文管會（徐伯元）一九八九、七四頁圖一四。
- 【註二四一】：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一九八三、四頁圖四之15。
- 【註二四二】：（江文）一九七三、六九頁。
- 【註二四三】：金琦一九六三、圖版叁之5。值得注意的是該「馬俑」背上有鑲狀飾，因此是否確屬馬，抑或為鎮墓獸類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
- 【註二四四】：常州市博物館、金壇縣文管會（徐伯元）一九八九、七四頁圖一四。
- 【註二四五】：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朱江、李鑑昭、倪振達、張寄庵）一九五七、一八九頁；王志敏、朱江、李蔚然一九五八、圖五。
- 【註二四六】：李劍農一九八一、一一九——一二頁。
- 【註二四七】：（屠思華）一九五五、一二二頁。
- 【註二四八】：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李蔚然）一九五九、一三四頁圖四之4。
- 【註二四九】：吳文訊一九七三、八九頁。
- 【註二五〇】：胥浦六朝墓發掘隊（吳煒等）一九八八、圖版貳叁之3。
- 【註二五一】：（吳文信）一九七五、九四頁圖三。該墓計出土紀年墓磚三方，一為元康二年（二九二），另一為元康九年（二九九），筆者依據年代較晚的紀年磚定年。不過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圖六〇之解說則認為係出土於元康二年（二九二）墓中。
- 【註二五二】：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九六五、圖版肆之1。
- 【註二五三】：胥浦六朝墓發掘隊（吳煒等）一九八八、圖版貳叁之6。
- 【註二五四】：（王德慶）一九五六、四一頁圖一。
- 【註二五五】：李蔚然一九八四、一三五——九頁。
- 【註二五六】：羅宗真一九八四、一二八——三四頁。
- 【註二五七】：鎮江博物館 劉建國一九八三、三三頁。
- 【註二五八】：蔣贊初一九八二、一九六——二〇五頁。
- 【註二五九】：中國硅酸鹽學會一九八二、一四五頁；李蔚然一九八四、一三六頁。
- 【註二六〇】：中國硅酸鹽學會一九八二、一四四頁。
- 【註二六一】：南京博物院一九八〇、一頁。

【註二六二】：南京博物院等（曾昭燏）一九六〇、五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一九六一、九四頁；蔣贊初一九八四、六六頁；鎮江博物館（蕭夢龍）一九八八、六三五頁。

【註二六三】：羅宗真一九八四、一三一頁。

【註二六四】：李蔚然一九八四、一三五頁。

【註二六五】：劉建國一九八三、三三頁；劉建國一九八九、八七頁。

【註二六六】：中村圭爾一九八二、四一——四七頁。

【註二六七】：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張志新一九八〇、二三六——三七頁。

【註二六八】：中村圭爾一九八二、八三頁。

【註二六九】：中村圭爾一九八二、五五頁。

【註二七〇】：據原報告書（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九七六）三一七頁稱六號墓可能即蕭秀墓，然據同文三三四頁所載「附錄」則稱六號墓可能為蕭秀家族墓，四號墓才屬蕭秀墓，前後文字矛盾。本文暫且參照中村圭爾氏（中村一九八二、八四頁）、李蔚然（李一九八三、三四四頁）及代表目前中國考古發掘成果的總結性專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一九八四、五三一頁）等文，將六號墓比定為蕭秀墓。

【註二七一】：李蔚然一九八三、三四四——四五頁。

【註二七二】：南京博物院（霍華）一九八一、一四——二三頁；另羅宗真一九七九、七九——九八頁參照。

【註二七三】：町田章一九八〇、一〇〇頁。

【註二七四】：馮普仁一九八五、二六九——七八頁。

【註二七五】：中國硅酸鹽學會一九八二、一七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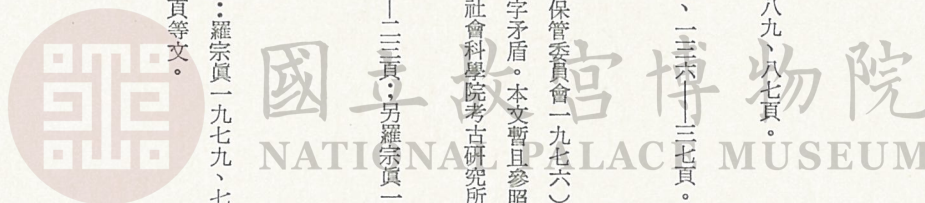
【註二七六】：有關六朝陵墓的推測和墓主比定可參見：羅宗真一九七九、七九——九八頁；中村圭爾一九八二、四三頁；李蔚然一九八三、三四三——六頁以及町田章一九八三、一〇七一——一一〇四頁等文。

【註二七七】：白英一九八〇、六三頁。

【註二七八】：孫機一九八七、二〇——二二頁。

【註二七九】：高至喜一九八四、一六二頁。

【註二八〇】：謝明良一九九〇a、五六——六一頁。



【註二八一】：謝明良一九八九、五三頁。

【註二八二】：過去中村圭爾氏曾指出，目前最晚的多室墓屬江東晉隆安二年（三九八）紀年墓，以後不見出土；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到底是考古發掘的偶然因素？或是多室墓於某一歷史時期趨於消滅？若屬後者其具體原因不明（中村一九八二、四二——三頁）。不過，於中原地區亦可見到由多室墓向單室墓變化的過程，至西晉中晚期單室墓已成爲中原墓葬的主要形制，而西北及東北地區亦於十六國時期完成了這一變化（張小舟一九八七、四一頁）。俞偉超氏亦曾指出約從三國西晉時期開始，許多身分極高的貴族墓往往變成單室墓，墓形制度從此進入一新階級，「漢制」已被逐出歷史舞台而出現了「晉制」（俞偉超一九八〇、三三七頁）。這種「晉制」當肇始於西晉，最終成熟於東晉（魏鳴一九八六、一三九頁）。

【註二八三】：魏鳴一九八六、一三三——四三頁。

【註二八四】：呂思勉一九六九、一一八一——九七頁；魏鳴一九八六、一三三——四三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故宮季刊 第八卷 第一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一四六 •